

5061/5600.1

THE CHINESE LIBRARY
OF THE HARVARD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UB

JUL 28 1959

中國語文

一九五四年

十一月號

29



中國語文雜誌社編

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中國語文 一九五四年十一月號目錄

- 新形聲字呢，還是拼音字？……………黃典誠（3）
- 漢語中的雙音詞（下）……………易熙吾（9）
- 識字教學中利用“漢字構成規律”問題的商榷……………賈援（13）
- 副詞跟形容詞的界限問題……………傅婧（18）
- 關於形容詞的範圍……………劉靜文（20）
- 怎樣改善寫字的技術……………陳光堯（21）
- 介紹幾種簡單的語音學儀器……………周殿福（23）
- 蘇聯《華語課本》中的漢語語法理論……………蘇聯伊三克等著 明揚選譯（29）

語文書刊評介

- 《中國文字拼音化問題》……………杜子勁（32）

信箱

- 談談文字改革的觀點和方法……………傅永康（33）
- “不”能和名詞聯合嗎？……………吳魯（34）
- 簡化漢字不應取消詞的形態區分……………吳熾堂（34）
- 漢語詞類分別的商榷……………劉冠羣（17）

語文筆記

- 關於動補結構問題……………劉世榮（8）
- 談帶“的”尾名詞……………君方（12）
- 標準語（語言學名詞選譯）……………劉湧泉譯（35）



新形聲字呢，還是拼音字？

黃典誠

切音新形聲字的理論家曾經列舉他們的制度的種種優點，要人家相信，這種制度果然是從中國語言的實際出發的，咱們應該表示歡迎；如果但憑個人的主觀立論，那就會妨害文字改革的順利發展。下面我想拿事實做根據來研究新形聲字論者所認為當然不誤的幾個問題。

一 漢語詞彙是不是屬於單音節性的？

今天，咱們還來討論這個問題，好像已經過時了。因為這個問題老早有了定論。蘇聯專家康拉德說：“咱們假定有一種語言，它全部的詞都是由單音節構成的。顯然，這種語言的詞彙就只有音節的數目那樣多；如果靠發展一些同音詞，詞彙的數目才比音節的數目多一點。大家知道，北京方言有420個音節。既然北京方言是漢民族語的基礎，那麼漢語就只有420個詞加上一些同音詞，而同音詞不可能特別多。這種情況顯然是不可想像的①。”“如果同一音節有不同的聲調就意味着詞的不同和意義的不同，那麼漢語的詞彙也就增加了一些。……北方話裏連不同聲調的也計算在內，共有1,380個音節，如果承認漢語的詞的單音節性，這只意味着全部北方話只有1,380個詞，再加上一些同音詞。當然，這也是不可想像的②。”其實漢語詞彙裏是有很多多音節詞的。它的詞彙無論如何都不可能少於任何高度發展的語言的詞彙。

這裏我們舉毛主席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開幕詞》中三段文字做例子：

我們這次會議具有偉大的歷史意義。這次會議是標誌着我國人民從一九四九年建國以來的新勝利和新發展的里程碑。這次會議所制定的憲法將大大地促進我國的社會主義事業。

我們的總任務是：團結全國人民，爭取一切國際朋友的支援，為了建設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奮鬥，為了保衛國際和平和發展人類進步事業而奮鬥。

我國人民應當努力工作，努力學習蘇

聯和各兄弟國家的先進經驗，老老實實，勤勤懇懇，互勉互助，力戒任何的虛誇和驕傲，準備在幾個五年計劃之內，將我們現在這樣一個經濟上文化上落後的國家，建設成爲一個工業化的具有高度現代文化程度的偉大的國家。

毛主席的語言是現代漢語的典範。毛主席在這個開幕詞裏用了這麼多觸目都是的多音詞，拿單音節性做爲漢語詞彙的必要標誌的論調應該可以取消了吧。

漢語事實上是多音節的，爲什麼偏有人說它是單音節的呢？這是一種誤解。推究誤解的原因，就是把漢語漢字混爲一談。一個漢字代表一個音節，每個漢字在字典裏都有自己的注解，字字有注解，就容易使人誤會這些都是語言構成的單位。其實漢字不會就是構成漢語句子的單位。例如咱們要說“解放台灣”，如果只說“解台”“放台”“解灣”“放灣”“解台灣”“放台灣”“解放台”“解放灣”，都不成話，必須說爲“解放台灣”才是可以被人理解的。可見“解放”是一個詞兒，“台灣”也是一個詞兒，“解”和“放”“台”和“灣”這四個字只是“解放”“台灣”這兩個詞兒的音節單位而已。

由於許多新詞是應用基本詞彙創造出來的（例如“熱水瓶”“高射砲”），而基本詞彙自古以來又是用方塊漢字保存下來的，人們就容易誤會一個個的漢字是漢語的造句單位。其實“熱水瓶”是一種用具的名字，“高射砲”是一種武器的稱謂。咱們要從整個詞兒裏去分析：“熱”+“水”+“瓶”=“熱水瓶”，“高”+“射”+“砲”=“高射砲”，完全沒有必要。因爲聽話的人是憑已經熟悉了的兩組聲音[ʒəʃueiphɿŋ][kaʊʃəphau]來理解這兩個詞的涵義的；並不是先懂了“瓶”和“砲”，然後問什麼瓶？裝熱水的瓶；什麼砲？向高處射擊的砲。有個方言管“熱”叫“燒”，管“高”叫“懸”，可是他們並不把“熱水瓶”改爲“燒水瓶”，把“高射砲”改爲“懸射砲”，一樣聽得懂，行得通。可見儘管構詞的當初或者是有其音有其義，可是用開之後，却成爲渾然

① 康拉德：《論漢語》第30頁。

② 同上，第31頁。

一體的東西了。因此“積字成句，積句成文”這種說法，對於脫離口語的仿古之作——文言文，或者還有些對頭，對於現代漢語來說，却是不能令人置信的。

到這裏，咱們可以看出新形聲字論者的論調是如何的不能成立了。他們說，漢語是單音節的；因為單音，不可避免的要出現許許多多的同音詞，在文字上，克服同音的唯一有效的辦法是“形聲相益”的制度。事實並不是這樣的。漢語既然有很多的複音詞，那麼同音的現象就相應的減少了。既然很少同音的現象那又何必向形義偏旁乞靈呢？

主張拼音文字加添形義偏旁的人們要知道：拼音文字附有形義偏旁對於詞義的了解是不會有什麼好處的。看了“梧桐”的“木”字偏旁，曉得它是木類，但是如果不看代表聲音的“吾同”，我們就僅僅曉得它是木類，對於客觀存在的“梧桐”還是距離很遠的。反過來，我們單單看描寫[u-t'ug]這聲音的純粹拼音的文字，我們就會馬上產生非常明確的概念，——一個身幹高大挺直，有着長柄大葉的喬木的影子就在腦筋裏出現。上面是就見其偏旁可以略知其類屬的形聲字說的；其實有好多形聲相益的漢字連這一點也做不到。試問“攝提貞於孟陬兮”，單知道“攝提”屬於“手”類，不是等於完全不懂得“攝提”嗎？這是比較古老的例子，讓我們換一個新鮮的來說吧。例如“幹部”，只曉得這兩字是分屬於“干”“邑”兩類，能算得什麼？魯迅先生在《人生識字糊塗始》一篇文章裏已經對從山的字例如“峻嶒”“巉巖”等下過完全否定的考語了①。

至於說中國語言是最適宜於用方塊字的，這也不是事實。現代漢民族語言的建築材料裏面有輕聲、有凡化，這些都不是漢字可以表示得了的。現行初級小學語文課本第三冊第五面第三行有這麼一句“我小心一點兒”。你曉得語文老師怎樣教小朋友？說來好笑，他竟教他的學生們唸爲[wo ɕiau ɕin itienər]。他把“兒”唸成一個獨立音節，而且是一個高升調的陽平聲。這位老師有錯兒嗎？沒有錯。錯的是漢字，用“一點兒”寫[itienər]，怎麼能够對勁呢？

要是說文言文是最適宜於使用方塊漢字的，那我們完全同意。方塊漢字對於不必用耳朵聽而只須用眼睛看的文言文，是再好不過的了。例如清人何棻作《梁夫人桴鼓助戰賦》末段這樣寫着：“客有嘆逝水之東流，話劫灰於南渡，想夫翻若驚鴻，出如脫兔。有聲有色，指揮落天女之花；其事其人，美豔奪將軍之樹。相當浮白，深杯談夢虎姻緣；合付汗青，瑋管記從龍遭遇。孰意傾城之哲，足以成城；願移作賦之才，爲其治賦②。”這種文章，練字練句，使事使辭，

都極爲“典雅”，就是念起來人家一句也聽不懂。寫文言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回了。用漢字來書寫現代漢語已經不能適應需要。一旦出現了統一的正式的拼音文字，漢字將慢慢的讓位給它，是毫無疑義的。

二 我國文字改革是否應該走切音新形聲字的道路？

新形聲字論者告訴咱們，從中國文字演變和發展的事實來看，合體文字的聲旁是非常不定的，可以任人隨意更動的。老的形聲字聲符既然是注音（就是所謂“直音”的方法）的，時間過得久了，也就不容易反映確切的字音了，因此他們建議改聲旁的注音爲切音（就是“聲母+韻母=音節”的老辦法）。他們認爲這方法知識分子容易接受，可以減少許多阻力；這是最徹底的改革方案。

我們認爲漢字歷史上果然有變更聲旁的事實，例如“證”→“証”，“鞞”→“靴”。但是這和咱們當前的文字改革沒有很多的關係。咱們當前的文字改革是漢語記號體系的根本改變，這種改變是爲滿足人民羣衆的需要和適應科學器械的設備而提出的。提出這樣根本改革的口號有沒有違背了中國文字發展歷史的規律呢？沒有的。郭沫若先生說：“從我國文字本身發展過程來看，由象形進到形聲，是合乎世界各國文字發展的一般趨勢即走向拼音化的道路的。中國文字走向拼音化，在各方面都有方便，如寫口語、用打字機以及和外族、外國交流文化、吸收其語言等等③。”

黎錦熙先生曾經說過中國漢字必須經過“改良”“改換”而後才能達到“改革”的目的④。假如這種說法可以成立，那麼，所謂新形聲字，最多只是漢字的改良辦法而已。這種改良辦法或者可試用，無論如何它不能成爲徹底改革的方案。

爲什麼我們說“或者可以試用”呢？原來在新形聲字的建議中，惟一的創造是改聲旁的注音爲切音，例如把“感覺銳敏”的聲旁“咸”改爲“兌”換爲“令兌兇奮”並改爲新形聲字“令兌兇奮”。這樣的改革，它的阻力，可以斷言，一點也不會比拼音文字所遭受到的更減少。相反地，恐怕還要增加。我們同意“改革文字最大的阻力，是已經認識文字的人”的說法，有些識字的人所以要反對文字改革，是因爲他懂得“感覺銳敏”

① 魯迅：《且介亭雜文二集》第82頁。1930年10月，魯迅全集出版社。

② 見余霽編《歷代文選講義》1941年廈門大學油印本。

③ 見《中國文字拼音化問題》第1頁。

④ 見黎錦熙：《國語新文字論》。

四個字，不認得“伶俐錫敵”。要是他是反對者的話，他對“伶俐錫敵”和“gangiao ruimin”是同樣表示抗拒的，他決不會因為前者是方塊形式因而橫生愉悅之感，因為後者是拼音字母，所以要特別深惡痛絕。相反地，假如他念過 ABC，懂得拼音的方法（在知識分子中間這種情況是非常有可能的），不要說，他一定會感覺到後者比前者要容易得多了。

如果認為咱們的漢語只能當面說說，過了時換了地就非用那超語言的漢字來表達不可，這種看法是非常危險的。因為根據這種看法勢必得出漢語簡陋漢字精密的結論。然而這種結論是跟漢語的實際情況一點也不相符合的。事實上，現代漢語是咱們民族今天唯一相當有用的交際工具，它幫着咱們交流思想，組織勞動。康拉德說：“現代漢語——漢民族語是以它的無比豐富的詞彙著稱的”。“詞在話裏頭聯結起來就表現它的語法形式，這種語法形式在特徵上、意義上是豐富而多樣性的”。“這種非常發達的詞彙和語法構造使漢語能夠表達出達到文化最高階段的人民的任何思想”。一切事實都在“證明漢語自古以來就是人類複雜思想的有價值的表達工具，現在是世界上最發達的語言之一^⑧”。

斯大林同志說有聲語言始終是人類社會唯一的能為人們完善的交際工具的語言^⑨。因此不能想像咱們日常進行交際的時候常常會因詞義不明而必須馬上加上“金”旁、“木”旁、“水”旁、“火”旁、“土”旁等等補充說明。這也就明白了咱們將來的新文字是只要確實表示聲音就完全無需乎形義偏旁的了。

既然這樣，那麼，咱們放棄形義的偏旁專取切音方塊形式可以嗎？我們的意見，還是不可以的。所研究語言學的人，大家無不同意“一音一符，一符一音”的先進的字母原則。關於用音素字母書寫漢語的處，據我們知道的有下面幾點：

(1) 雙音素字母所代表的音素，都是單音素字母有了的，只要連寫兩個音素就好，不必另外添造許多字母，例如 a+o=ao(ㄠ)，這樣可以減省多造和多學一些字母的麻煩，在學習的時候，可以節省記憶力，印刷打字也比較方便。

(2) 音素字母可以表現收尾輔音，例如“平安”裏的 p'ian。又方言裏的 -m -p -t -k，也可以充分利用，例如閩南話的 dam-pak(南北)，kiatsok(結束)。

(3) 音素字母便於現代漢民族語言的凡化。例如“花兒”：xuar，“小孩兒”：giauxar，“手絹兒”：təyœr。

(4) 音素字母便於表現現代漢語的連音變化的語

氣詞。例如“來啊”：lai ia，“走啊”：tsou wa，“多麼不幸啊”：tomə pugin ɲa。

(5) 音素字母便於表示語音的類化，例如福州話“宵”音 siu，可是在“元宵”一詞裏變為 ɲuonɲiu。

(6) 用音素字母拼寫漢語，最便於兄弟民族的參考採用。音素字母數目少，機動性大；如果採用雙拼的聲韻制度，字母數目多，機動性少，願意向咱們看齊的兄弟民族要參考採用就有很大的困難了。譬如僮僮語有八九十個的韻母，再加上聲母，要造一百多個符號，怎麼有可能呢？

那麼，採用音素字母納在一個方塊的形式裏來拼切可以嗎？這也是不可以的。這條路咱們的鄰居朝鮮民族已經走過了。他們的“諺文”就是這麼辦的。例如 ㅈ[k]，ㅌ[t]，ㅊ[a]，合起來，“ㅈㅊ”是“國家”。據說他們已經感覺到這樣拼寫很不方便，他們的政府已經在1948年2月3日發表關於成立“朝鮮語文研究會”的決定，並由共和國的領導同志之一的金科奉出來領導，已經團結了著名語文學者如申龜鉉、金壽卿、朴宗軾等，根據科學的理論，從事朝鮮語文的研究，他們準備從漢字的橫寫及綴字法等製定統一的方案，進一步創造新文字，全面進行語文改革^⑩。

拼音文字不但不適宜於採用方塊形式，而且也不便於直行使用，最好的辦法是自左而右地橫行。郭沫若先生說得好：“就生理現象說，眼睛的視界橫看比直看要寬得多。根據實驗，眼睛直看向上能看到五十五度，向下能看到六十五度，共一百二十度。橫着向外能看九十度，向內能看六十度，兩眼相加就是三百度；除去裏面有五十度是重複的以外，可看到二百五十度。橫的視野比直着要寬一倍以上。這樣可以知道，文字橫行是能減少目力的損耗的，並且現代科學論著多半已經是橫寫，因此我建議將來拼音化了的中國文字宜橫寫右行^⑪”。

可是新形聲字論者必然還要說，過去有些學者硬說中國人的祖先，不用拼音而造方塊字，是走上了一條歧途，而不去想一想為什麼要用方塊字。有些學者羨慕蘇聯，土耳其拉丁化運動的成功，而沒有想一想，它們本就用拼音文字，用新式拼音來代替舊式拼音，在形式上沒有特殊的改變。我們認為責備咱們祖

⑧ 康拉德：《論漢語》第48頁。

⑨ 康拉德：《論漢語》第7頁。

⑩ 斯大林：《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第46頁。

⑪ 見潘朗：《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1951年初版第190頁。

⑫ 同⑥。

先不早點創造拼音是不對的；同樣，認為今天不應該採用拼音也是不能沒有錯誤的。“爲什麼要用方塊字”，這問題好多人考慮過了，用的原因當然不只一個，可是跟人民羣衆長期在封建主義的壓迫下沒有獲得充分的學習文化的機會這一點應該是分不開的吧。文化壟斷在少數的士大夫階層手裏，任憑怎麼難，他們總可以窮年累月地去研究它，正是這一小撮人懂得大多數人不容易懂得的難東西，所以他們能夠騎在人民的頭上成爲特殊的人物。在舊社會，曾經有過這樣的風氣，就是寫文章的人，如果能夠多用一些別人看不懂的古字，多用一些別人不知道出處的古典，那麼他就是一個可以睥睨一切的文士了。試想在這種風氣之下，怎麼能夠設想文字有徹底改革的奇迹呢？文字的發展是有其本身的規律的。雖然東西各民族文字發展的實況很不平衡。在西方，埃及原先也用過類似咱們方塊字的象形字。在埃及的象形字裏面，半形半聲的合體字也不少。可是埃及後來並沒有用新形聲字去代替舊形聲字，埃及已經老早實行拼音文字了。由此可見，世界文字的發展由形而音的規律是不會差錯的。只是隨着使用文字的人民的具體歷史條件不同，因而或快或慢罷了。要是說，只有用新拼音替代舊拼音才能成功，那麼，咱們對於越南人民廢止漢字，採用拉丁字母，竟在短短七年之間掃除文盲一千四百萬（他們全國人口只有兩千多萬）的事實，又將如何解釋呢？可見只有新形聲字可以替代舊形聲字，新拼音字可以替代舊拼音字的說法是毫無事實的根據的；事實證明，恰恰是拼音文字完全有取代舊形聲字的可能。

三 拼音文字在中國到底行得通行不通？

新形聲字論者或者可以說，拼音文字在越南可以取漢字而代之，那是因爲越南的情況跟中國不同。中國有廣闊的土地，衆多的人口，悠久的歷史，高度的文化，豐富的遺產，這便注定只有漢字能夠擔負得了書面的表達的任務，至於拼音文字，已經由拉丁化運動證明其永遠行不通了。

新形聲字論者對於拉丁化運動的譏笑其實是不必要的。在中國文字改革運動過程中，拉丁化論者所付出的努力是不可厚非的。他們的作爲是和咱們民族解放運動分不開的，這個早年的文字改革運動的積極性和創造性，首先引起了代表咱們文化方向的偉大文學家、民族英雄魯迅先生的無限同情與大力支持。在魯迅先生晚年的一段時間裏，他彷彿是以全力來參加並領導這個運動的。這完全可以由他的《門外文談》《論中國語文的新生》等得到證明。

自然拉丁化新文字不能就是漢語文字改革的最完善的方案，它可能有缺點，可是它的拼音的方向是全正確的。對於一個基本上是正確的而部分尚有缺點的東西，咱們似乎不應該採取一概抹殺的態度。事實上拉丁化不會像新形聲字論者所說的那樣一文不值。大家只要看一看東北鐵路管理局採用拉丁化新文字電報的輝煌成果，也就知道拼音文字在中國是如何可以通行^②了。

其實像新形聲字論者所舉以非議拉丁化方案“iu iu iu iu iu iu（又有油，又有肉）”，就是在漢字裏面也可以找到同樣的例子。好像“朝朝（日日）朝（動詞）朝（動詞）朝（名詞）朝（早晨）朝（動詞）”，有幾個，能夠明確它是什麼意思？

相反的，“又有油，又有肉”，在拉丁化方案裏來是不成什麼問題的，因爲正確的寫法是 iu iou iu iou iou rhou。最近看到上海新文字工作者協會寄來的修正草案《漢語拼音字母及其用法要點》，知道他們已經採取了標注聲調的辦法。根據這個草案“又有油，又有肉”，應該寫爲 juh jou jux, juh jou rouq, 就更加準確，更加不會誤會了。

新形聲字論者譏評拼音文字的一點是拉丁化方詞彙繁多，十萬二十萬條的詞兒，對於任何人的學習是萬難吃得消的，因此他們堅持使用形聲合體的方字的主張。他們完全不懂得，詞彙豐富，正是咱們民族語言被稱爲全世界最發達的語言之一的的原因。難道咱們願意咱們的語言貧乏落後嗎？對於十分豐富的詞彙，咱們不必担心，其中最能發生作用的基本詞彙咱們日常已經掌握了，其餘的詞兒就看大家的需要去積蓄好了，一個人完全記住民國語言的全部詞彙是不必要的。新形聲字論者認爲形聲合體的漢字本領高強，聯綴靈活，一個人只需記得千個單字，就能任意組織詞語了。至於看別人寫的，也可以由一個個的漢字去認識。如果所說的是事實，那麼，爲什麼懂得“月”字又懂得“旦”字的人會不懂得“月旦”是什麼意思呢？難道對於像“月旦”這樣的詞兒咱們可以不學而能嗎？可見用詞兒繁多責備拼音的拉丁化新文字是不應該的。

自然拉丁化運動時間還不太長，可以總結出來的東西還不可能很多，它果然有全部頂替漢字的能力，恐怕還有人不肯就相信。這兒且讓我們再就漢語某方言中舉一個已經實行拼音文字一百年的例子來證實。

^② 看陳秉武：《東北鐵路採用拉丁化新文字電報的經驗》，《中國語文》1953年2月號第13頁。

在咱們漢語的幾個重要地方方言中，有一種號稱閩南話的，它流佈的區域主要在福建南部：廈門漳州泉州三市和龍溪晉江兩專區。因為歷史上人口的移動，所以台灣全省和南洋各屬也都有成千成萬的人說這種話。據估計，漢族人民說這種話的大約有三千萬人。漢語史家證明，在這種地方方言中，所保存的古漢語的因素要比北方方言多一些。首先讓咱們容易觀察到的是在它的聲韻系統中一方面沒有ㄓㄒㄝ，一方面有 -m -p -t -k。其次在這種地方方言中還常常出現單音詞，例如管“太陽”叫“日”，管“月亮”叫“月”。說這種方言要使用拼音文字是會有更多的不方便的，可是事實正相反。原來這種方言使用拼音文字已一百年了。一百年來，有用方言拼音文字編寫的字典、故事、醫學、地理、歷史、尺牘等等的書籍；更奇異的，用拼音文字居然也可以翻譯和注釋袁凡《綱鑑》和《四書》《五經》等等，一切事實都在證明拼音文字書寫地方方言，上下古今，無往而不利；而不是用方塊的漢字，却在在都發生困難。舉一個例來說，在閩南方言中，①語音和讀音是分得清清楚楚的，例如“北京”語音 [pakkiā]，讀音 [pōkkiŋ]。在

一句話裏面，什麼地方該用語音，什麼地方該用讀

*Koh-si iāu-piāu.
Jiong-hua jin-bin hong-ho hek te it hua
chuan hek jin-bin tai-pian tai-hue chuan
chut-pau hie-gi, hin-a-jit te sin-to
Pak-hui hin-hong.*

*Tai-pian chong-sò 1226 lāng, pò-tò ē
tai-pian 1211 lāng, si-pi-ā tai-chi-ho. hō
tò-tai pò-tò ē tai-pian 15 lāng, pò-tò huan
si-pi-ā tai-chi, hin-a-jit lūn si dhoat.
sik ē tai-pian 70 lāng, hin-a-jit hie-gi
sit-sit hin ē tai-pian 141 lāng, hap-ti
hoat lit hui-tong ē lāng sò.*

*Jiong-hua jin-bin hong-ho hek, te it hua
chuan hek jin-bin tai-pian tai-hue chuan
chut-pau hie-gi hin-a-jit te sin-to.*

音，絲毫不能差錯。例如“解放後的北京進步很快”，用漢字寫出來完全看不出這種語音讀音交叉為用的實況，如果用拼音文字寫出來，那就清清楚楚一點也不含糊了。請看kái-hòng

āu ē Pakkian chin-pō chin khoài。瞧，這句話裏“解放”一詞要用讀音，所以寫為kái-hòng，要是語音，那就要寫為kai-páng了，可是話裏面是不這樣說的。

下面讓我們再舉一些實例來證明漢語是如何宜於採用拼音文字。

(1)有關科學技術的：●

Ū-si eng suprarrenal extract ē iōh lāi chū-siā. in-ōi beh chí huì ē iān-kō. Iā eng ergot ē iōh lāi chū-siā. á-si chiah, ōe chí chú-kiong chhut-huih.

Ū-si bán chhui-khi liáu-āu, chhui-khi-hōa, huìh lāu bōe chí. Nā eng chí-huih ē iōh, chhui-nih ū phāi ē bí, khi-hōa iā ōe nōa-khi. Tē it hō ē hoat, si eng chit tē sōe tē ē mī-se, hē ti chhui-khi khang-lāi. Tāi-seng chiong huìh-tē sōe hō chhut-lāi, chiah eng chit-ē sōe tē ē kan-á-that, hit ē tōa sió tiōh kap chhui-khi-hōa ē khang pi-pi. pí chhui-khi khang koai tām-pōh. Eng pheng-tōa tui thau-khak-tēng, pák tui hā-gok-kut lōh-lāi, hō hit ē khi-hōa bōe tín-tāng, án-ni teh hō ān, iā ōe chí huìh.



Tē 209 tō. —Phi-khang chhut-huih, eng mī-se hap, chhui-leng-tō-jō-kōg, that phi-khang ē kō-phi-kháu (Morrow).

Phi-khang chhut-huih ē ti-liáu hoat: Kah pi-lāng tō-teh, nā iū-goān bōe chí, tiōh khōa huìh tui tō-lōh chit pēng ē phi-khang lāu-chhut-lāi, chiah eng mī-se kā i that hō ān. Ū-si eng peng hē phi-khang-lāi, á-si phi-niū-tēng, á-si ām-kún āu-pēng, iā ōe chí-huih. Ū-si nā eng mī-se that phi-khang, huìh ōe tui chhui-nih chhut-lāi; hit si, i-seng sō teh eng ē hoat-tō, si ti chhui-lāi ē āu-bin lāi that āu-phi-kháu. Chit ē hoat-tō si hui-khi, khān-hō chiū mī-biān eng, tiōh i-seng chōe chiah ōe eng-tit.

Nā si phui-huih ē lāng, hit ē huìh kō ti nā-āu, tiōh chiong huìh-tē thēh-chhut-lāi, chiong pi-lāng ē chim-thau sōa hē pi-á, chiong bin-chhng khōa kha ē sō-chai tiām hō koai (chit chhiōh chiū hō), tiōh hō thau-khak pi kha khah kē.

Thō-huih kap khak-huih (sàu lāi phui-huih) si bo sa-tāng; sàu ē huìh si tui hi-chōng sàu-chhut-lāi; thō-huih si



210



211

Tē 210 tō. —Eng kē-si chiong chit liáp mī-se that āu-phi-kháu (Morrow).
Tē 211 tō. —Āu-phi-kháu that liáu (Morrow).

① 參看黃典誠：《從閩南的白話字看出拼音文字的優點》，見《中國語文叢書》《拼音文字和漢字的比較》第79—89頁。1944年5月中華書局出版。

② 見戴仁壽：《內外科看護學》第336—337頁。1917年9月台灣台南新樓病院發行。全書675頁，插圖503幅，彩色17幅。

(2)有關時事學習的：(見7頁上)②

(3)有關古代文獻的：④

Chú-lō-chiōng jī hō, gū-tiōng-jîn, í-tiōng hō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
tiāu. Chú-lō-bān-oat: Chú-kiàn hū-chú hō?
蘇。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
Tiōng-jîn oat: sū-thē put khūn, ngó-kok put hun,
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
siók-tūi hū-chú! sèk-kí-tiōng jī-tūn.
孰爲夫子！植其杖而芸。

Chú-lō-tè-tī khōng-chú ē-ka-chiah-āu, tú-tiōn-chit ē-lāu-lāng, ēng-koái-á-giá-chháu-nâ.
Chú-lō-mūg-i kóng Lí-ū khōa-kìn goán-sian-si
bō? Lāu-lāng kóng, kha-chhiú-bō beh khūn-kín,
ngó-kok boē hiáu hun-piat, tsh-lóh-chit lāng-sī
lín-sian-si? kóng liáu-āu, chōe-i chhah-koái-á
khì-khau-chháu

這種文字用的只是23個字母(a b ch chh e g h
i j k kh l m n ng o o p ph s t th u)，學習起來

極其容易，大約一個月可以讀，兩個月可以寫，五歲的小孩子能够學會，八九十歲的老人家也可以學會。今天閩南各地流行着這種拼音文字，定生產計劃，聽報告，記筆記，和親友通信都可以應用它。信寄門鼓浪嶼，即使信封上不寫方塊字單寫拼音文字，一樣不留滯地可以送得到。這是一個堅強有力的事實，它證明漢語使用拼音文字是完全可能的。

③這是一個老太婆(莊適昌先生的母親)用閩南話白字翻譯毛主席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開幕詞全文手稿的一部分。這位老太婆今年66歲了。她寫音文字是用毛筆寫的。

④見改良新版《下論語》第90頁。1924年廈門萃經印。本段譯文：子路落在孔子後面，碰着一個老人，用杖挑着草籃子。子路問他，你看到我們的先生嗎？老人說：脚不肯動作，五穀不會分別，哪一個是你的先生？說了後，只管插着杖子去鋤草。

關於動補結構問題

劉世榮

《語法講話》第三講第二節“補語”一項說，“動詞或形容詞後面可以另外加上動詞形容詞之類，來表示前一個成分的結果、趨向、可能性等，這一類成分叫做補語，因為它對前一個成分有所說明，有所補充。”例如“我把屋子打掃乾淨”的“乾淨”、“我寫完了文章”的“完了”，都是結果補語，又如“打倒地主”的“倒”，“搞好生產”的“好”，也都是補語，這些例子都很正確。可是另外有兩個例子——“走進”、“走出”，認為“進”和“出”是“走”的補語，我認為還值得提出來討論。

補語既是說明或補充它前一個成分的，所以就不是句子的基本成分，沒有它，句子仍然成立。用該書所舉的例子“送來”“送去”來看：“農民送來公糧”。“我們送去慰問信”。又如：

農民打倒地主。

大家搞好生產。

這幾個句子沒有“來”“去”“倒”“好”，仍然成句子，不失其主要“送”的意義，“來”“去”“倒”“好”補充了“送”的意義。

孤立來看“走進”和“走出”，“進”和“出”像是說明“走”的趨向的，可是放在句子中，它們就不是“走”的補充成分了。例如：

我們愉快地走進學校。

學生興奮地走出教室。

這兩句話的基本意思是“我們進學校”、“學生出教室”，如果說“我們走學校”、“學生走教室”，就不通了。我們再用相似的句子比較一下：

我們跑進學校。

學生跳出教室。

這兩句話的基本意思也是“我們進學校”、“學生出教室”。從“走”“跑”“跳”的動作區別來看，它們是修飾“進”和“出”的，也就是“進”和“出”的修飾語，所以“進”和“出”不是“走”“跑”“跳”的補語。

再比較這樣句子：

他走了：他走進來了。

第二句和第一句的意思正相反，第二句的“進來”還是主要語，不是補充成分。

你走吧：你走出去吧。

這個“出去”和“走”的意思是相同的，沒有它或它前頭的“走”意思一樣，還是沒有補充的作用，所以這“出去”也不是充成分。

由前句看來，“走進”“走出”不是動補結構，而與該書三講第四節“向心結構”的定義相合。“向心結構由修飾語中心語組成，修飾語在中心語的前頭。修飾語能限制或描中心語。”前句的“走”“跑”就是修飾語，是描寫中心語“進”和“出”的，“走進”和“走出”都是向心結構。

我的一點小意見不一定正確，希望得出一個結論。

人民教育出版社 聯合啟事

郵電部北京郵局

今年十一月份爲各地郵電局徵求1955年度雜誌訂戶的期間，(具體開始及截止日期由當地郵局另定)爲便利需要長期訂閱雜誌的讀者，本雜誌可以預訂到1955年年底。請按時向當地郵電局辦理預訂手續。

漢語中的雙音詞(下)

易 熙 吾

三 字書上的雙音詞

古來字書和詞書是未曾分清楚的，詞多半是包括在字書裏。我們不管它怎麼分法，却知道在字書裏確實有許多雙音詞。

第一，《爾雅》。《釋詁》頭一條的“權輿”就是不能拆開的雙音詞。其他篇中的雙音詞也多，《釋訓》一篇除了“朔、媛、彥、鬼”幾個單字和少數成句的字以外，盡是雙音詞。

第二，漢朝揚雄的《方言》。雙音詞也不少，如嗟、嘍、嘍咷、嘍悠等等。

第三，漢朝許慎的《說文解字》。這部書自來都認為字書。它以一字一音的漢字為解說對象，其實裏面不只有單音詞，也有許多雙音詞。它把一些原來是雙音詞的拆開成兩個字，却在各個字的下面分別註明兩字拼合的那個詞。我們試取虫部的字來研究。虫部共有字153個。把這些字分類來看：第一類，蝦，蝦蟆也；蟆，蝦蟆也。蛭，蛭蟻也；蟻，蛭蟻也。再也沒有別的解說。像這樣的雙音詞，本部裏還有蛄蚰、蟠蟠、蜚蟻、蜚蟻、蜚蟻等四十九個。第二類，本部一字加上不屬本部的另一字成為不可拆開的雙音詞。如青蚨、虎蟠、尺蠖、蜥蜴等，共二十三個。第三類，《說文》上記的是單字，而在別的書是雙音詞。這一類有侵蝕、蝗蟲、蛻化、野蠻、雖然、強壯、蚯蚓等，共十四個。以上三類雙音詞共八十六個，佔了虫部總字數的一半以上。第四類，在當時單音詞和雙音詞同時存在使用，後來單音詞或演變為雙音詞：如虹，蜺蜺也；蜺，蜺蜺也。或演變為短語：如蜺、蘭蟲；蜀，葵中蠶；蜺，蜺子。其他如蟬叫知了，蛭叫馬黃。《說文》虫部中常用的單音詞只有二十三個，加上不常用和成了死詞的四十四個共六十七個。這個統計說明了《說文》虫部以雙音詞佔優勢。

第二類中，蜺演變為蜺蜺，蜺演變為蜺蜺，明明是單音詞演變為雙音詞，“蜺蜺”“蜺蜺”都是兩個音節有機地結合着，不能拆散的。儘管後來造了新形聲字“蜺蜺”“蜺蜺”，在文字上“蜺”“蜺”“蜺”“蜺”都能獨立，但實際語言却不是這麼樣，這是應該加以區別的。又虫部常見到的二十三個單音詞，現在也大半變

成了雙音詞。還能說古來的漢語是單音節語嗎？

或者有人說虫部多動物專名，所以雙音詞多。好吧，我們就翻開別的部來看看吧。玉部：璠，璠璠也；璠，璠璠也。瑾，瑾瑜；瑜，瑾瑜也。玫，火齊，玫瑰也；瑰，玫瑰。琅，琅玕；玕，琅玕也。艸部：蒿，蒿蒿也；蒿，蒿蒿也。茱，茱萸；萸，茱萸也。走部：趙，趙趙，行不進也；趙，趙趙也。趙，趙趙，久也；趙，趙趙也。金部：鎡，鎡鎡，火齊；鎡，鎡鎡也。系部：繫，繫繫也；繫，繫繫也。言部：譌，譌譌也；譌，譌譌也。酉部：醕，醕醕，醉也；醕，醕醕也。這類雙音詞，《說文》中很多部都多多少少地有一些，並不只限於虫部。

第四，魏張揖的《廣雅》。《釋詁上》頭一行的“萌芽”就是不能拆開的雙音詞。《釋訓》自“顯顯”起至“無慮”止，全篇都是雙音詞。王念孫說：“揚推無慮，皆兩字同義。後人望文生訓，遂致穿鑿而失其本旨。大抵雙聲疊韻之字，其義存乎聲，求諸其聲則得，求諸其文則惑矣。”

第五，唐朝釋玄應的《一切經音義》。試取其中的《大方廣佛華嚴經》五十三卷來看，八十九個詞中，雙音詞有八十五個之多，如罽毘、顧盼、妖艷、船舶、眩惑、漑灌、彌綸、迴復等等都是拆不開的。可證明唐朝的漢語詞彙有許多的雙音詞。

第六，明朝方以智的《通雅》。《釋詁》中譌語重言的“仿佛”、“錄錄”是不可拆開的雙音詞，其他綴集的故實、摺拾，古集、欵乃、枝梧，《釋天》的“嫦娥”，諺原的“阿堵”，雙音詞也多得很。

第七，明朝朱謀埠的《駢雅》。全書搜集古書的雙音詞約有八千多個。

第八，清朝洪亮吉的《比雅》。由《釋詁》的“逍遙”、“相羊”起，雙音詞也不少。

第九，清朝吳玉搢的《別雅》。雙音詞共有三千五百多個。如“空同”、“空侯”，都是古人習用的雙音詞。本書單音詞不過幾十個。王國維在《古文學中聯辭字的研究》中說道：聯辭字借二字而成一語，其實猶一字也。前人《駢雅》《別雅》諸書頗以義類部居聯辭字。

第十，清朝史夢蘭的《疊雅》。全書盡是一字重疊為二字的雙音詞，共有四千三百多個。古書上的重疊

詞是很多的，如《詩經》的“燕燕于飛”，“關關雎鳩”，“于時言言”，“于時語語”等等。

以上十種是以前出的書。我們再看一看近年出的辭書：

第十一，中國大辭典編纂處的《國語辭典》。據汪怡先生的序說：“就……普通卡片說，已達一百二十餘萬條之多”，還有其他卡片不在其內。這書只用了十數萬條。以“巴”字為例，單詞用法只有八項。而由“巴”字構造的雙音詞有37個；又以“法”字為例，單詞用法只十三項。而由“法”字構成的雙音詞有107個。這充分證明了雙音詞遠遠超過單音詞。

第十二，中華書局的《辭海》。試舉“丁”字為例，單詞用法只有八條。而由“丁”字構成的雙音詞有48個。其中不可拆開的有“丁丁”、“丁令”、“丁東”、“丁香”、“丁當”、“丁寧”等20個。

第十三，朱起鳳的《辭通》。搜集古書中的雙音詞，自“丁東”開始，至附錄的“物色”終止，共計約四萬個。別體異文，也是雙音詞，都包括在內。

其他如王國維《聯綿字譜》收雙音詞2774個，符定一的《聯綿字典》在上篇已經說過了，這裏不再重複。

四 檢查統計過的雙音詞的數字

在一篇文件或多篇文件內，在一部書或幾部書內，選出其中單音詞、雙音詞、多音詞來統計究竟每種數目有多少，這工作曾經有人做過。我現在找出一些來列在下面：

第一，黎錦熙在1922年8月《國語月刊》《漢字改革號》上，取葉紹鈞作的《低能兒》的第一節四段文章，分析詞類列爲下表：

- | | |
|--------------|--------------|
| 1) 漢字總數 800 | 2) 詞類總數 470 |
| 3) 單音詞總數 193 | 4) 單音生詞數 85 |
| 5) 複音詞總數 277 | 6) 複音生詞數 217 |
| 7) 漢字生字數 327 | 8) 詞類生詞數 302 |

這個統計數字，複音生詞比單音生詞約多兩倍半。而複音詞中，又以雙音詞佔最大多數。他並且聲明，不只統計這八百字，還作了五萬多字的統計，結果跟這個數字大致相同。

第二，王文新在1931年《教育研究》29期起發表一篇《小學詞彙分級研究》，取小學課本和作文九十一萬餘字，分析詞彙計有：單音生詞960，複音生詞6,239。複音詞比單音詞約多五倍多，而複音詞中仍以雙音詞佔最大多數。

第三，國語教育促進會調查過北京語詞，只要是口頭上應用的，不論新舊一律蒐集，編了一部《標準

語大辭典》，採用的單字，以合於口頭應用的單音詞和辭典裏所應用的爲限。那麼，這些單字的總數比單音詞還要多些。

1) 全書總字數 4,736

2) 單音詞比 4,736 還要少，例如“國圖”一雙音詞列二單字。

3) 複音生詞數 36,000（這三萬六千詞是在七萬餘詞裏選出來的。

複音詞中仍以雙音詞佔最大多數。

第四，文斌在《新語文》50期的《漢語單音詞和複音詞的統計》文內，取《毛澤東號》、《龍鬚溝》、《水滸傳》和《反對黨八股》四篇作品中各一段來分析單音詞和複音詞，結果統計如下：

1) 共有詞 8,021

2) 共有生詞 2,899

3) 單音生詞 636 佔總詞數 24.6%

4) 複音生詞 2,263 佔總詞數 75.4%

以上四種統計，只算出複音詞比單音詞多三倍至六倍，複音詞中還未再分出雙音詞和多音詞，僅僅得到一個雙音詞多過一切詞的概念罷了。下列三種統計，就是把雙音詞再分了出來的。

第五，艾偉在1949年《漢字問題》的詞彙研究，取商務印書館的復興、基本和中華書局的初小國語讀本二十四冊，分析詞數略如下表：

1) 共用字 201,040

2) 全書共同所有的生字數 1,378

3) 單音生詞數 3,215

4) 複音生詞數 17,442

這個統計數字，單音詞等於生字約三倍，複音生詞等於單音生詞約六倍。再把所有用過的複音詞加以分析，統計如下：

1) 雙音詞 49,938

2) 三音詞 6,786

3) 四音詞 1,401

4) 五音詞 69

5) 六音詞 19

6) 七音詞 12

7) 八音詞 5

8) 九音詞 0

9) 十音詞 1

雙音詞在複音詞中，竟佔了85.5%。

第六，速記月報社曾經統計過《論共產黨員的修養》，共有字數40,466個。做成22,882次個詞。內有單音詞8,365，複音詞14,517。在複音詞中有雙音詞12,190個，佔全詞數約57%，佔複音詞數約84%。

第七，我在廣西大學教研室時，作了一篇《整理古今詞彙提綱》論文，曾經分析蘇聯馬林科夫主席給我們毛主席祝賀國慶節的電文裏的詞彙，做了一個統計：單音詞佔全詞百分之二十，雙音詞佔百分之五十七，超過總數一半以上，超過單音詞一倍半。

詞的界說，現在還沒有定論，姑且自成一說。我暫定為語言中一個概念為一個詞，例如：“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一個專名詞。“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為一個形容詞，因為它只是一個概念，這個概念是分不開的，分開了就不是這個概念了。這是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四個基本詞所構成的。雖然這七字又可拆開為中間、榮華、人類、民衆、共同、倡和、國家，但已經不是那個所指的概念了。有人以為七字為一詞太長了，應該分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三個詞，這也是合理的。但在學習上七字一詞，連寫在一起，比較好懂些。雖然缺點在詞彙數量的增多，這正是語言發展的結果，在先有語言的寫話條件下，詞彙多了，並不是困難問題，在詞兒連寫上，七字分寫三下，把一個整體的概念分開了，使學者注意力拆散來用，不見得是學習便利的方法。好在我們現在是討論雙音詞，拆開來更足以證明雙音詞的增加，當然這其中也還有許多問題，但並不能動搖到我的漢語基本上是雙音節語的主張。

漢語是有形態的，不過不能用外國語言的標準來衡量罷了。上面提到的馬林科夫主席的電文中，有“正在”的“正”、“感到”的“到”（現在）、“表明了”的“了”（過去）、“沿着”的“着”和“已經”“業已”，這些都是表明時間性的形態。任意“地”、偉大“的”、生活“力”、生活“的”、工業“化”詞，性是分別得很清楚的。我和我們，一和一種，這和這個，是有數量副名限制的。深為、引為的“為”已經失了原意，成了深、引的附加，也變為形態了。王引之的《經傳釋詞》說：為，語助也。與，語助也。所謂語助就是這種字，毫無意義。若以實義釋之，反會把文章弄得扞格難通。這就是古詞的形態了。

在第五、第六、第七的三個統計表內，已經確實證明雙音詞在全詞中佔百分之五十以上，說雙音詞在漢語中佔優勢，實在是最正確的說法。

五 說漢語是單音節語錯誤的一般

外國人不懂漢語，說漢語是單音語，自然是無足怪的，可惜我們自己也模模糊糊，沒弄清楚。現在指出一般錯誤的根源。

第一，古人解釋經書，硬把雙音詞拆開來說。例如詩經“窈窕淑女”的窈窕，本是一個雙音詞。而揚雄《方言》說成：“美心為窈，美狀為窕”。又如《荀子》的“分分共有終始也”，分分即《說文》的份份，《論語》的彬彬，重文雙音詞。而楊倞說成“名分”的“分”。又《爾雅》《釋詁》的“覯擊”，郭璞說即“彌離”的雙音詞，並

指出孫叔然字別為義的不當。後來武億潘衍桐却仍主一字一義，他們都是不懂語言的本原，被漢字蒙蔽住了。清代學者中間王念孫、王引之他們比較是懂得語言的本原的，例如王念孫在《讀書雜誌》中說：“凡連語之字，皆上下文同義，不可分訓，說者望文生義，往往穿鑿而失其本旨。”王引之在解釋《大戴禮》的“庸孰能親汝乎”的“庸孰”時，指出“庸孰”是複語，都是“何”的意思，不能分開解釋。

第二，陸志章先生在1938年做了一本《國語單音詞詞彙》，後來改名《北京話單音詞詞彙》出版。他用了漢字2,731個，作出單音詞1,199個。人們見了這部書的名稱，常常誤會為北京話只是單音節的詞了。其實這本書只用二千多個漢字來研究一千多個單音詞，比起《標準語大辭典》的四千多個單音詞還差得很遠。據《標準語大辭典》北京話七萬餘的複音詞只選了三萬六千多，而《北京話單音詞詞彙》這部書並沒有研究複音詞。北京話的複音詞究竟有多少，這部書完全沒說到。研究單音詞，也只有一部分，並不是詞的全面。萬不能說北京話就是單音詞，這個誤會可就大得很了。

這部書所說的單音詞也還有問題。張洵如先生在《新語文》44期說：1) 由複音詞裏抽出一個音來說是單音詞。如：明明是“漆黑”二字，偏說“漆”一個字。2) 分化了複音詞。如：“持久”作“持了久”，“生產”作“生過產”。3) 省略複音詞為單音詞。如：“除非”作“除”，“處理”作“處”。他在本書十七頁內統計了931個單音詞，裏面有加着、了、起來、進去等頭尾的173個，有相屬關係的複音詞308個，這兩項已把複音詞誤認為單音詞超過了一半。可見這本書所舉的單音詞還不到一半是真的。依照張洵如先生的說法，這本書的一千一百多個詞，最多也只有五六百個單音詞是真的。比起七萬餘北京話的通用詞來，真不可以道里計了。這樣就說北京話是單音節語，或說北京話單音詞佔優勢，都是不正確的。

第三，有些人把雙音詞全認為複合詞。複音詞和複合詞的名稱，在以前是模糊分不清的。黎錦熙先生在1950年重校的“複合詞構成的方式簡譜”還用複合詞的名稱。林漢達先生在《中國語文》發表過幾篇關於詞兒連寫的文章，才把這兩個名稱明確起來。兩字相合，表達一個概念，不能分離，離開了就不是原詞的意義，這才叫複音詞。其實在語言中詞彙用的音節，以兩個的為多，單音節的居少數。例如一個“家”字，《說文》說是形聲字，從宀，豕聲省。一說：古人家裏養豬，從宀中豕，是會意字，與牢字筆字同義，本義

是家庭。在現代漢語中沒有單說一個“家”音的，如果說出，當然可誤會為傢、佳、夾、加、枷。但就《新華字典》來說，用家字構成的詞有家庭、家父、家常、家畜、家族、家門等，專家、姑娘家的詞尾，固然都是不能拆開的，而保家(衛國)、老家、張家、我家等複合詞，或者是文法上的短語，也出不了雙音詞的範圍。家字除了《新華字典》所列舉的以外，當然還有很多。例如國家、家伙、家具、家鄉、家屬，回家、搬家、在家、世家、家用、家主、家私、家門、家政、家信、家譜、家學，單一個家字的音，在語言裏是不會存在的。漢語由單音詞向雙音詞的道路發展，才解決了同音混淆的問題，名詞已儘量變了，動詞變了一部分，也還有單音詞。但是如有誤會，這個單音詞，一定也要變成雙音詞，這就是漢語的特性。那種含有誤會因素的語言，因為自然演變，單音詞成了雙音詞，語言才達到了健康和純潔的境地。這是我們受了斯大林《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學說的啓示，在漢語歷史發展中得出來的規律。從廣義說，複合詞也是複音詞，由林漢達先生的證明，複合詞專用久了，也可變為複音詞。這個理由是正確的。例如：“馬車”本是由“馬拖的車”四個字音的短語變來的。“布鞋”本是由“布做的鞋子”變來的。都只有一個概念。又如“搬家”一詞的含義，是搬運家庭裏的人和東西，家庭概念中所指房屋並不搬動。家既變了家庭，為甚麼不叫“搬家庭”？因為變了“搬家”雙音詞後，表達意義已够明顯而簡潔，不必再加庭字了。三個字音變為兩個字

音，仍然合於漢語是雙音語演變的規律。有些人硬把複音詞認為複合詞，全是受了漢字的影響，所以錯認漢語是單音節語。若把複合詞都認為複音詞，毛病就是詞典內收之不盡，詞數多到無限。П. Я. Зинзев說：“中國每一個字為一個詞，中國只有四萬五千個詞，比英國法國的詞還差得多，不及他們的一半。”是不合於事實的。中國詞書如《國語辭典》、《辭海》、《佩文韻府》的詞總超過了十萬。現在語言中通用的詞彙，還沒有人做過全面的整理，在1934年間，北京國語教育促進會花了七年工夫，搜集北京話裏通用的詞彙得了七萬餘條，還未完備。滕砥平先生譯的《我們周圍的化學》說：物質的種類現在已經知道的，數目在二百萬以上。劉澤先先生說：說詞兒的數目是無限的，也許會恰當一些。漢語的詞彙，豈只僅有這些數目。康拉德說道：“就詞的數量來說，漢語是世界上最豐富的語言之一”。不過可以肯定，詞彙隨着社會發展而發展，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一日千里的進步，以後詞彙的數量，一定是一天多過一天，詞典內詞彙的增加是必然的。詞彙根據語言來的，在語言內懂了的詞彙，只要把音讀出來，聽的人定能了解，學起來並不困難。若遇有少少不懂的，儘可以查詞典。詞彙多了，並不像漢字多的那樣難學。詞彙越多，每個詞的含義越明白固定，才能够表達高深繁複的思想，各種學問技術才能發達，才能做到毛主席期望的“中國將以一個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現於世界”。

談帶“的”尾名詞

君方

帶“的”尾型的名詞在日常語言中相當多，它的構成詞幹有的是動賓結構，有的是形容詞，也有動詞直接加“的”的。從前有人認為是代名詞性質的，可是現在看起來就不盡然了。在一定的常用性和不可分性的條件下，這類加“的”的名詞似乎應該使它定型化。蘇聯新出版的《華語讀本》講到漢語的名詞，也提到說，這種結構是名詞型。

《語法講話》裏說：“……動詞謂語加‘的’字變成體詞結構。……形容詞加‘的’字也變成體詞結構……”接着說“勇敢的、老實的、酸的、大的”在形容詞謂語句中都是“類名”。我想，既然說是“類名”，不妨拿它同名詞一例看待，或者叫做“形名詞”。

形容詞的形態有名詞的功能，在其他語言，如英、俄語中是常見的，在詞典裏大多是另列一條。這一點漢語有其共同之處，也不妨在詞典裏使它定型化。

常用性比較大的“的”尾名詞，有很多是單式或複式的動賓結構，都是多音節的詞；複式的動賓結構中有的屬於成語或短語的範圍。即如“賣菜的”、“打鼓兒的”、“說書的”、“唱戲的”、“吹喇叭的”、“搖鈴的”(北京街巷游動的針線小販)等等都是單式動賓結構；複式的如“拿刀動槍的”、“說長道短的”、“沒皮沒臉的”、“嘻皮笑臉的”等等，不必多舉，在日常說話中隨處都能聽到這樣的多音詞。這些詞兒的意義代表一個完整概念，有它的不可分性。

用這類名詞當然也要聯系到它的語法環境，不能孤立來理解，就是說要看它在上下文裏的地位。這一點特別是形容詞加“的”變成名詞的情況，大多要看說話聽話時的對象，才能理解它的意義範疇。試比較：

我就不愛吃酸的

這個是酸的

前一句所說“酸的”可能指一切酸的東西，後一句的“酸的”當然是特指的東西，都要看說話時的對象條件。

口語裏帶“的”的名詞和文言帶“者”的名詞有關，從前就有人說它是由文言(古漢語)變來的。《新華字典》裏在“者”字第二義下說：“相當於‘的’，使形容詞、動詞或短語成為指人或事物的名詞。”《史記》《呂不韋傳》有“行金六百兩，予守者”；《左傳》有“肉食者鄙，未能遠謀”；此外如王者、使者等等，都是和現代口語中的帶“的”的名詞一致。不過，現代語裏“者”字已專用做詞尾，不做別用，如學者、記者、勞動者、共產主義者等等。這類已定型的“者”尾名詞是不能隨便把“者”換成“的”的。同樣，口語裏習慣用“的”尾的名詞也不能改成“者”，所以說，帶“的”尾的名詞只要是常用性大而且不能隨便拆開的，應該說已趨於定型化，在詞典裏應有一條地位。

識字教學中利用“漢字構成規律”問題的商榷

賈 援

速成識字法的推行，在識字教育上掀起了一個研究教學方法和教材編寫的熱潮。不論是改進通常的教法也好，豐富、發展祁建華的速成識字法也好，都是在教材、教法上想辦法。就所見到的材料說，屬於利用“漢字構成規律”的，要算是當中的一個主流。

最初，速成識字法的“突擊生字”還沒有十分注意到字形問題，只是等到“突擊生字”以後，來一個“俘虜站隊”，（“俘虜站隊”就是抄寫學過的單字，按着它們的字旁分別歸納到一起，像：帶草字頭的字都集中到一塊兒，帶三點水的字也都集中到一塊兒。）才有些人試探着把某些個字形跟字音乃至於字的意思或用法上有聯系的漢字，運用到識字教學上來幫助記憶。

目前我們還是用漢字掃盲，漢字的字形不能很規律，很準確地表示出它固定的字音來。拼注上注音字母，並不是把這個困難完全克服了，只不過是字形本身以外加上一根“拐棍兒”或一塊“名牌兒”。事實上，不能永遠叫學員非仗着“拐棍兒”不能走路，老得靠着“名牌兒”才叫得出這個字的名字來。在漢字本身上能找到一個竅門，確實是一個很好的辦法。因為很多材料中，對這個問題的看法還不大一致；具體的辦法上也有很大的出入；尤其是這個竅門究竟能有多大，能起多大的作用，估計得更不一樣。現在打算就這方面來談一談。

把“漢字構成規律”適當地運用到識字教學上來

把“漢字構成規律”運用到識字教學上來，根據所見到的材料說，開始提出使用這個辦法的，是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工農業餘教育司 1952 年 8 月編的《速成識字法教師手冊》和《農民速成識字教材》中的《注音詞表編排說明》；再有就是《中國語文》1952 年 9 月號上登載過林漢達同志的一篇《突擊生字與開展閱讀的教學要點》，這篇文章就說得更為明確，更具體了。

那時候，首先提出的是注意字形的分析。因為注音字母只能幫助解決字音問題的一部分；分析字形，讓文盲學員不至於再把字兒看成是“沒邊沒縫的一個

黑團兒”；此外，再加上詞兒連讀，可以知道單字的一些通常用法。目的都是幫助記憶，集中力量從一個字的各方面去認識它，這樣才容易求得鞏固。

分析字形的頭一步，是先認識那些字形構成上的零件，零件包括基本筆劃和一些在別的字中常作為諧聲偏旁或部首用的常用字。這種字叫做單純字。主要是先學這些單純字，然後再學那些由單純字構成的結合字，以便於分析字形，如：先學會單純字“口、女、禾、少、心、火、自、因”等，再學由它們所構成的結合字“品、委、如、和、秒、妙、吵、炒、秋、愁、咱、息、熄、媳、姻、烟、恩”等，分析字形就容易了。

後來，也有把單純字叫做“單體字”，結合字叫做“合體字”的。為了避免人家把它們狹義地解釋成為“獨體曰文，合體曰字”的那兩種字，最好還是用單純字、結合字這兩個名字。因為“文”和單純字，“字”和結合字，所指的東西不完全一樣。固然像“刀”、“鳥”也是獨體的“文”，也是單純字；“植”、“好”也是合體的“字”，也是結合字，這樣的字怎樣叫也沒有問題。可是像“琴”、“泉”等原來雖然是獨體的、象形的“文”，而不是合體的“字”現在要把它們分析成：“琴”字，是上頭兩個“王”字，底下一個“今”字；“泉”字是上頭一個“白”字，底下一個“水”字，它們都是結合字。再有，像“立、半、走、言”等，這些原來都是合體的“字”，我們根據現代楷體的字形，就得把它們算是單純字。

同時，單純字也並不是絕對的。像“奴、息”等字，在開頭學它們的時候，可以說是由“女、又”“自、心”等單純字分別構成的結合字；等到以後分析“努、怒、媳、熄”等字的時候，“奴”和“息”都是熟字，也就可以作為單純字看待，不一定再進一步去分析它們本身了。

分析字形的再進一步，就是分析某些結合字的時候，從字形的構成部分上，找出些跟字音乃至意思或用法上的聯系。如：“熄、媳”等字，如果“息”字的字音，“火、女”等字的意思預先都學會了，這對於記憶“熄、媳”等字的字音和意思都會有一定的幫助。但是像這樣的字很少；就算是在字形上只能單獨解決字音

問題而沒法兒聯系到意思的字，如：“妨、放”音“方”，“置、值”音“直”等這一類的字，也不怎麼多。

“漢字構成規律”能够運用到識字教學上來的，基本上就是這些個了。也可以說，這個規律是適用於識字教學的規律，而不單純是文字學上的規律。

幾種利用“漢字構成規律”的意見

自從把“漢字構成規律”運用到識字教學上來的這個意見提出以後，跟着各地就有些照這個辦法編寫的教材，最多的是一些可以說是接近這個意見的意見。這些意見綜合起來，大致有下邊幾類，不過當中還有不少值得討論的地方。

一 部首和單純字

有的認為單純字就是部首，因此就先教全部的部首：把“宀”念作“nǐ”，“父”念作“fǔ”像“飛、鼠、鼻、齒”等等這些筆劃挺複雜，而且在它們這一部中只有它本身是常用字的也都拿出來先教。有的把一些口語裏不大用的字，如：“且、其、凡、及、曾”等，只因為它們是單純字，也都拿出來先教。

單純字不一定是部首，如：“巴、元、由、才”等單純字，在《康熙字典》上就不是部首。而部首也不一定是單純字，如：部首中的“香”可以分析為“禾、日”兩個單純字，“支”可以分析為“十、又”兩個單純字。

爲了便於分析字形，適當地結合着教一些零件，倒是有些好處的。部首中的“宀、父、一、乚”等，最好不必念它們原來的字音，可以用它們的俗名，如“寶蓋”、“反文”、“秃寶蓋”、“走之”等等。這樣，不但說出來好懂，學員也不致把它們當作單字。因為學員一拿這些零件當單字看待，跟着就要問它們的意思和用法，如果認真地講解起來，很可能越弄越不明白。其它一些沒有俗名的零件，跟注意字母形象相似的，如“勺、口、厶、尸、幺、乚”等等，必要的時候，也不妨拿注音字母的音作爲它們的名字。

先教單純字，再教結合字，這一點也別弄得太機械了。有些口語裏不大用，不容易講解的單純字，如“且”、“其”等字，可以先不教。先教由它們所構成的那些結合字，如“祖”、“期”等字。反正能讓學員知道有這樣形式的一些零件，以後見着跟它們有關的結合字，只要能認清：“祖”字的右半邊加上個“女”字是“姐”字；“欺”字是“期”字去掉“月”字換上個“欠”字，也就行了。

因為實體名詞比抽象的或用處較小的詞類容易記憶，有些結合字是實體名詞，而構成它們的那些單純

字是抽象的或用處較小的詞類，這就要先教結合字。以後在教那個單純字的時候，就可以從結合字中反過去分析，如：“燈”字去掉“火”，就是“登報”的“登”字；“漿”字去掉“水”，就是“將來”的“將”字等。

還有些單純字，像“凡”字由它所構成的結合字只有一個“帆”字，“式、以、康、龍”等這幾個單純字，由它們所構成的結合字，在常用字中也只有“試、似、膝、髒”等一樣一個字。這些對於分析別的字用途不大的單純字，也不一定都需要先教。

二 同部首的字和同音字

有的把部首相同的字都排列到一起，認為這樣可以幫助記憶那些字的意思和用法。他們的理由是帶口字邊的字都跟嘴有關係，帶三點水的字也都跟水有關係。有的把同音字都排列到一塊兒，認為只要頭一個字注上音，其餘的就不必注音了，而且可以讓這些漢字相互作爲字音的“拐棍兒”。

這兩種辦法恐怕都還值得考慮。部首究竟能幫助說明單字的意思或用法到什麼程度，以後咱們再研究。把屬於同一部首的字都集中到一起，常用字中，“手”部共有一百一十三個字，“水”部有八十七個，像“人”、“心”、“采”、“肉”等部也都有好幾十個字。過去有的識字班用這種排列方法來複習單字，就有學員說：“這些字好像都穿一樣兒的衣裳，戴一樣兒的帽子，認不出誰是誰來。”複習熟字的時候還是這樣，要是用這種辦法去編寫識字教材，學員頭一眼看到的滿是生字，那就更容易混淆了。

另一方面，機械地按部首分別排列，有些字也成問題，像把“才”、“承”歸入“手”部；“垂”、“報”歸入“土”部；“業”、“棗”歸入“木”部等等。這些還不像“立人”、“側刀”、“提手”、“三點水”等，雖然變了形狀，可是都挺明顯地出現在字的半邊上。在“垂”字裏很難一眼就找到“土”字；在“才”字裏頭根本就沒有一個完整的“手”字。“之”字的“丿”挺突出，但是它屬於“丿”部；“丸”字的“丶”雖然藏在裏頭，却把它歸入“丶”部。如果採用這樣的教材，恐怕光講部首的辨認，就得先費很大的工夫。

把同音字排列到一塊兒來教，有些音節中的常用字很多，如：“hi”這個音節就有三十三個字，“p”有三十個字，“hi”、“l”、“tl”、“cx”等也都有二十多個字。一大串生字都念一樣的音，聲調雖然不完全相同，可是各有各的意思和用法，而且有很多的字在字形上彼此沒有一點兒聯系，如：“志、至、治、制、秩、質、置”等字，這樣，很難說對於記住這些字能有多大幫助。只求得別把這些字的意思和用法弄顛倒

了，恐怕就很不容易。至於說用這些漢字相互作為字音的“拐棍兒”，可是咱們並不是要求學員只會在課本上念這些字就算成了，也不是教他們用漢字注音。這麼說，結果不過是課本上少印幾個注音字母罷了。

字形上有聯系的同音字，如：“妨、放”和“置、值”等類的字，有選擇地、適當地排列到一起，對於記憶它們的字音倒是有幫助的。就是這樣的字，也不能一下子來上它好幾個，給學員造成可能把用法鬧錯的機會，而且還要先學會了“方”、“直”等字作為基礎。

三 口訣和圖畫

有的用口訣來分析字形，如：“有木也是橋，無木便成喬，去掉橋邊木，加女便成嬌。”“月要腰，西示票，米加斗字便成料。”還有像字謎似的，把“郭”字編成：“一點一橫長，口字在中央，子字來拉架，耳朵墜老長。”這都是把一些字編成有韻的口訣，教學員背誦來幫助記憶字形的。有的把一些象形字、指事字、會意字，先畫出圖畫來，底下寫出這個字的兩種篆體，最後才是它的楷體，也認為這樣可以幫助記憶。

這兩種辦法都容易弄成牽強附會。適當地偶而這麼來一下，學員也可能覺得有興趣；弄得厭煩了，反而會形成負擔。

編成口訣，一面要把很多的字都編進去，一面又要合轍押韻，編法上就會受到很大的限制。韻文雖說容易背誦，但是意思不連貫的，也不一定全都好背。字謎形式的更不能多來，為了記住一個字，先得把好幾句挺沒意思的話背熟，這種辦法是很不經濟的。

圖畫也是這樣，拿象形字來說，今天通用的楷體字，早就不是“畫成其物”的形象了。就是篆字，有的也不怎麼像它所表示的那個東西。誰都知道：天上的日頭不是個方塊兒，鳥沒長着四條腿；可是楷體字就硬要這麼寫。識字教學並不是講漢字的演變史。這種辦法把一切楷體字溯源上去，最後畫一個圖畫，有些個字還得叫圖畫還就着文字的形狀，在篆字和圖畫之間，還夾着一個字形還就着圖畫的篆字。這些字，每一個都要經過好幾道手續，像“背”、“俘”等字，還得通過“北”、“孚”等字才能把它們說清楚，也就太麻煩了。

圖畫很難免陷於牽強附會，有的畫一個人坐在一棵樹底下，用它來說明“休息”的“休”字。雖然《說文》上說過“休”是“從人依木”，但是事實上，坐在樹底下的人並不一定都在休息，同時休息的人也不一定非坐在樹底下不可。照這樣的辦法去講解，弄得多了，很容易引出些原來可以不發生的、題外的問題來。

四 筆劃分類和字形分析

有些強調分析筆劃的，筆劃的名稱既不統一，而且分法也很不一致：有用“永字八法”的那些挺不通俗的名稱的；還有把某些筆劃按它們的讀音來念的，如“丶”念作“㇀”，“丨”念作“㇀”等等，把筆劃分成八種、十種、十二種或更多的都有。本來就不統一的筆劃名稱，因此就更不統一了。有的把字形分析得過於繁複，弄成為分析字形而分析字形。

事實是這樣：筆劃的種類分得越細緻，名稱也就越繁多，每一類裏所包括的筆劃形式就越少、越明確；反過來，筆劃的種類分得簡單些，名稱也就少了些，而每一類裏所包括的筆劃形式就要多一些。應用到識字教學上來，好像是筆劃的名稱要分得簡單一些，而每一類裏所包括的筆劃形式却又要少一些，這樣才合乎理想。這確實是個矛盾，怎麼解決呢？我認為筆劃分析並不是書法練習，而是為了記憶字形。一般說筆劃種類還是分得簡單些較好，教鉤這種筆劃的時候，可以多分析幾個帶着不同的鉤的字，學員大體上能明白都是些什麼筆劃叫作鉤就成了。如果來它一大堆“正鉤”、“反鉤”、“俯鉤”、“仰鉤”、“折鉤”等等名稱，恐怕會把學員嚇住的。

分析字形既然是為了幫助記憶，如果弄得太複雜、太牽強了，反而可能把學員搞糊塗了。用處不太大的零件，如：“肅”、“蠅”、“皺”、“腦”、“講”、“獵”、“藤”、“脈”等字字形上的某些構成部分，都沒有適當的名字，也就不必硬給它們起名字，免得增加學習上的負擔。必要的話，可以分析一下這些零件的筆劃，讓學員認清楚它們是怎樣構成的。再有像“匠”、“匣”等字從“匚”，“匹”、“區”等字從“匚”，反正“匚”、“匚”都是兩畫，分析字形的時候，也可以把它們作為一類看待。又像“全”、“內”的“入”，事實上，人們早都把它寫作了“人”，也不如就把它看作“人”算了。在這類的字中，一定要把“匚”、“匚”，“入”、“人”分開，既沒有多大必要，而且可能講不清楚。

“漢字構成規律”運用到識字教學上來的局限性

目前有一個趨勢，就是過分地強調“漢字構成規律”的功用，好像是只要能利用“漢字構成規律”去編寫識字教材，學習漢字的一切困難都可以迎刃而解。因此談一談我們對於“漢字構成規律”的估價，是很有必要的。

先就字音說，形聲字雖然包括聲符和意符兩個部分，但是因為聲符和意符都是歷史上留下來的東西，

因此照現在的普通話的讀音來念，並不是每個字的讀音都跟它們的聲符一樣的。一般所謂利用“漢字構成規律”，主要就是指這部分形聲字說的，咱們現在就來算一算賬罷。在兩千個常用字中：跟聲符讀音一樣，聲調不一定相同的字，約有三百多個，佔兩千的百分之十五強；跟聲符只是聲母或結合聲母相同的字，不到六十個，佔百分之三弱；跟聲符只是韻母或結合韻母相同的字，有兩百掛零，佔百分之十強。我們暫時把頭一部分叫做規律的，後兩部分因為聲符不能表示整個的字音，叫做半規律的。這樣，連規律的帶半規律的都加到一塊兒，再往寬裏打，怎麼也不到百分之三十。由此可見所謂“漢字構成規律”可以利用的部分是很有限的。

聲符在字形上並沒有固定的位置，如：“貢”字的聲符“工”在上頭；“零”字的聲符“令”在下頭；“領”字的聲符“令”在左邊；“鈴”字的聲符“令”在右邊；“固”字的聲符“古”在裏頭；“閤”字的聲符“門”在外頭。究竟字形上的哪一部分算是聲符，並不是識字不多的學員能一下子辨別出來的的事。這就是說辨別形聲字的聲符，是沒有什麼規律可依循的。

即使把聲符辨別出來了，也還有這麼一個問題。相同的聲符在不同的字上，有好幾個不同的讀音，如“油、袖、抽、笛”等字的“由”；“刮、括、活、話”等字的“舌”。還有些字，更換了它們的聲符，它們的讀音和意思都不變，如“墳”可以寫成“坟”，“線”可以寫成“綫”，“麵”可以寫成“麪”，“藥”可以寫成“葯”等。這樣，就算知道哪一部分是這個字的聲符，要是沒經過教學或沒查過字典的話，誰也不一定能把這個字的字音完全念得正確。

再就字的意思和用法說，意符照現在常見的用法看，也很難說能夠準確到什麼程度。“碗、罐、瓶、杯、盤”在今天一般多半是陶瓷、燒料一類的東西，字形上却用了“石、缶、瓦、木、皿”等不同的幾種意符。不要說像“人”、“女”等部的那些字，很多字的意符簡直沒法兒解釋，就拿能夠比較固定地表示財貨交易的“貝”說，也有些不大好解釋的，如“賢”、“賽”、“贊”、“責”等字，根據現在通常的用法，也看不出它們跟財貨交易有什麼密切的關係來了。

有些字的意符可以更換，它們的意思和讀音都不受影響，如“唇”字可以寫成“脣”，把它的“口”換成“丹”；“迹”寫成“跡”，把“辵”換成“足”；“歎”寫成“嘆”，把“欠”換成“口”；“堤”寫成“隄”，把“土”換成“阝”等等。可是別的一些字的意符就不能都照着這幾個字的辦法去更換，一更換它們，可能字就變得不成字

或者變成另外的字了，如：“吐”的“口”旁換作“丹”就變成了“肚”，“逃”的“辵”旁換作“足”就變成了“跳”，“歇”的“欠”旁換作“口”就變成了“喝”，“坊”的“土”旁換作“阝”就變成了“防”。從這裏可以看出，想拿意符來說明字的意思，是靠不住的。

同時，意符在字形上，也跟聲符一樣地沒有固定的位置，“關”字的“門”就是意符，“閤”字的“門”就不是意符。有些字的意符只要一搬家，就變成跟原來完全不同的兩個字，如：“忘”跟“忙”，“閃”跟“們”，“細”跟“累”等。

由意符跟意符構成的會意字也是一樣，像“小”、“大”是“尖”，“日”、“月”為“明”，固然很好。這類的字更沒有多少，而且學員也沒法分別出究竟哪個是會意字。如果過分地強調了，學員照意思推論下去，類似“千”“里”是“遠”不是“重”，“寸”“身”是“矮”不是“射”的笑話，也不是絕對不可能發生的。

總起來說，有規律的漢字並不十分多，而且還得除去那些不能應用到識字教學上來的。所以說，把“漢字構成規律”運用到識字教學上來，是有很大的局限性的。識字教學中，適當地選擇些規律的字先教，讓學員懂得一點兒字形構成上聲符乃至意符的作用，對於記憶是有幫助的。所以說，能幫助記憶的話，也只是因為上課的時候講過，學員們的印象比較深刻一些，等到自己複習的時候，能夠幫助回憶、聯想罷了。

結語

形聲字中聲符和意符的作用，就算是最規律的，也不要過分地強調。因為不規律的畢竟還是挺多的。先講規律的，後講不規律的，要讓學員知道不完全是規律的。規律的形聲字，只不過是“由簡及繁，從易到難”的“簡”和“易”的部分，後邊並不是沒有“繁”和“難”的部分了。過分強調聲符的作用，會讓學員養成讀半邊字的習慣；過分強調意符的作用，也會讓學員養成“望文生義”的毛病。

在識字教學中運用“漢字構成規律”，先要注意到所教的對象是文盲或半文盲的學員，不能多講屬於文字學範圍的道理。同時，要時時刻刻想着：分析字形是為幫助記憶，達到學員們能夠認清楚了字形，而且便於記住那個字的讀音和用法，算是適度。超過了這個適度，由於不能普遍地適合學員的學習要求和接受能力，教學效果就要遞減了。如果弄得過於繁複而到了難懂的程度；牽強到不着邊兒的地步，這樣的所謂利用“漢字構成規律”，也不是絕對不可能變成妨害記憶的東西。

識字教學中利用“漢字構成規律”對於認識某一些字是有幫助的，但是學習漢字的根本困難仍然是存在的，廣大的工農羣衆要正確地掌握文字工具，並不是只要利用“漢字構成規律”就可以全部解決問題的。根本的問題是漢字太繁雜了，打算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只有從漢字本身的改革上着手。

最近北京東四區職工業餘學校有兩個實習班，學員都是文盲，注音字母拼音教材是三十課拼音課文，內容有短句也有故事，因此他們的學習興趣很高。教完這冊教材，一共用了三十八小時的課堂教學時間。現在學員們絕大多數都會拼寫請假條或短文了。筆試的時候，用拼音出題(教師不念題)和答題，十個題目一般

都不到兩小時就交卷了，快的只用了一個小時。其中一個班，二十五個人參加考試，結果：一百分的八個人，九十分以上的九個人，八十分以上的四個人，七十分的一個人，六十分和六十分以下的共三個人。考試以後的一次座談會上，學員們有的說，他現在能看懂注音漢字的衛生標語了；有的說，他去找一個剛從外地來的朋友，沒見着，他就把自己的住址用注音字母拼寫出來給朋友留下，正好他朋友也學過注音字母，就按着地址找到了他；有的說，如果大家都用注音字母的話，我們不認識字(漢字)也就不算是文盲了。

如果漢字是拼音文字的話，這些學員只要用學會那本拼音教材的時間，就可以基本脫離文盲的狀態了，

漢語詞類分別的商榷 劉冠軍

我對高名凱教授的“漢語沒有詞類分別”的說法是不同意的，原因是：一、他看問題的方法在某些地方值得研究；二、他的說法發展下去的結果是危險的。現在就從這兩方面提出我的意見。

(一)

高教授看問題的方法在某些地方的不夠恰當，可以從他答覆穆德洛夫同志的文章中看出來。穆德洛夫說：“爲什麼‘山’、‘水’、‘魚’、‘人’可以直接(或者藉助於量詞‘座’、‘條’、‘個’)跟‘這’聯合而不能跟‘不’直接聯合，而‘走’、‘想’、‘看’可以跟‘不’聯合而不能跟‘這’聯合？這不就是‘山’、‘水’、‘魚’、‘人’在語法上區別於‘走’、‘想’、‘看’的標誌，因而也就是詞的語法的歸類即詞類嗎？在我看來，是的。”(《中國語文》24期：《漢語是有詞類分別的》)高教授反駁道：“這一段話不但與事實不符，而且違反原則。事實上‘山’、‘水’、‘魚’、‘人’可以跟‘不’聯合(例如，‘他簡直畫得山不山，水不水，魚不魚，人不人’)，‘走’、‘想’、‘看’事實上可以和‘這’聯合(例如，‘這一走，這一想，這一看’)。(《中國語文》26期)

顯然，穆德洛夫同志的見解是正確的，因爲他所說的是漢語的一般的規律。一般的規律並不排斥個別的、特殊的現象的存在；個別的、特殊的現象的存在也推翻不了一般的規律。高教授所舉的例證雖然也是客觀存在的(現在姑且不論‘他簡直畫得山不山，水不水，魚不魚，人不人’這句話是不是省略句，‘這一走’、‘這一想’、‘這一看’的‘走’、‘想’、‘看’是不是動詞，以後有機會再討論)，但却是個別的，不足以否定一般規律的存在。何況我們只能說‘這一看’，‘這一想’，‘這一走’却不能說‘這八看’，‘這九想’，‘這十走’呢？單說‘日內瓦不日內瓦’，‘鋼筆不鋼筆’能行嗎？高教授企圖用特殊的、個別的例證來維護自己的理論，這就是把樹木當作森林了。張志公同志說得好：“如果我們對一般的、特殊的和個別的現象不加以分別，其結果不是被那些特殊的和個別的東西擾亂了視線，終於否定了規律的存在，就是武斷的用一般規律去否定特殊的和個別的現象的正確性，違背了語言

的實際。”(《語文學習》31期：《一般的、特殊的、個別的》)如果研究漢語語法的學者不能正確地對待漢語中一般的、特殊的和個別的現象，那麼漢語語法永遠也找不出一條規律來。

(二)

高教授在《漢語的語句》一文中說：

漢語有三種不同的實詞：名詞、動詞、形容詞。漢語的句子也依照它的謂語以哪種實詞爲主要成分而分爲三種：

(甲)名句，(乙)形容句，(丙)動句。

以名詞爲謂語或謂語的重要成分的句子是名句，回答“什麼事物”的問題。如：“我是中國人。”以形容詞爲謂語或謂語的主要成分的句子是形容句，回答“什麼樣子的”問題。如：“他壞。”以動詞爲謂語或謂語的主要成分的句子的是動句。如：“她唱歌。”(《語文學習》11期)假如我們給學生出這麼一道題：造一句名句(或形容句、動句)。照高教授的說法，漢語既然是沒有詞類分別的，那末學生究竟到哪兒去找一個名詞(或形容詞、動詞)來做這名句(或形容句、動句)的謂語或謂語的主要成分呢？又如學生造了一句“他不中國人”，我們不從詞類的相互關係上去指出副詞不能修飾名詞，又有什麼方法去使初學語法的學生迅速地理解這種句子的錯誤呢？

否認了漢語有詞類分別，其危險性還不止此。更危險的是這種理論發展下去，它將否認了漢語有語法。Л.В.Щерба在《論漢語》裏說過：

蘇聯的漢學家承認漢語裏有詞類的存在。Л.В.Щерба、Л.В.Щерба、Л.В.Щерба、Л.В.Щерба的著作也都提到這點。Л.В.Щерба在他的著作《現代漢語語法研究》中對這問題做了一個最新的研討。無疑的，這部著作是現代關於漢語詞類的最完善最科學的有證據的定義和敘述。而蘇聯的漢學家們充分估計到漢語中詞類存在的意義。例如Л.В.Щерба認爲“詞類是語法系統的中心，它反映在詞組的結構和各種類型的句子中。離開了詞類就不能了解漢語的結構特點，也就不能說明漢語的語法。難道我們認爲漢語沒有語法嗎？高教授不會不承認漢語有語法，但是從他否認漢語詞類分別的理論看來，那是已經包含着這樣的危險性了。

副詞跟形容詞的界限問題

傅 熳

副詞跟形容詞糾纏的地方很多。如何規定副詞和形容詞的界限，至今還是語法上一個沒有解決的問題。“高、低、遠、近、大、小、快、慢……”等詞能修飾名詞也能修飾動詞，這些詞應該歸入形容詞，還是應該歸入副詞，或是兼屬兩類？語法學家的看法很不一致。關於規定副詞的方法，過去語法書裏，主要的有三種不同的主張。

第一種主張：凡在句中修飾形容詞、動詞、副詞的詞，都是副詞。用這個標準規定副詞的可以拿黎錦熙先生做代表。黎先生的《新著國語文法》裏，副詞中有性態副詞一類，性態副詞又分表示主觀的和客觀的兩種，包括做形容詞、動詞的修飾語和補語的詞。關於表示客觀的這一小類，黎先生說“大都是由形容詞或動詞轉成的”，如“奮發有爲地、糊塗懶散地、遠遠地、（看）清楚……”等是。此外，修飾形容詞、動詞的名詞，如“雲（集）、林（立）、碧（綠）、血（紅）”等，也收在這一類裏^①。

第二種主張：只能修飾形容詞、動詞，不能修飾名詞的詞，算副詞。用這個標準劃分副詞的是王了一和呂叔湘兩位^②。他們根據這個原則，只把“很、太、又、不、別、再、也、還、就、剛、幸虧、漸漸、大概……”等當副詞，至於“大、小、快、慢、高、低、正確的……”這些詞修飾動詞的時候，仍然算形容詞，不算副詞^③。因為這些詞能修飾動詞又能修飾名詞。

第三種主張：凡處在副詞地位（即修飾形容詞或動詞）的詞，如果跟它們修飾名詞的時候意義相同，還算形容詞，如“慢（走）、高（飛）”之類是。要是意義變了的，如“老哭、直忙、白說”的“老、直、白”等等就算副詞。假如詞義改變的程度不能決定，那就從寬處理，算副詞，也算形容詞。陸志章先生就用這種方法來規定副詞^④。

以上諸家根據三種不同的標準規定副詞，他們給副詞所劃的範圍也各有不同。“很、太、不、別、又、再、都、就、還……”這一類只能修飾形容詞、動詞和副詞的詞，各家都收在副詞裏，是不發生疑問的。除此而外，還有哪些詞該歸入副詞，各家的看法就不同了。這幾家給副詞所劃的範圍以黎先生為最寬，王先生、呂先生最窄，陸先生介乎其間。這裏的關鍵問

題是：那些能修飾名詞又能修飾動詞的詞，是不是該同時屬於副詞。

按照第一種標準，大多數的形容詞同時也都是副詞，因為大多數的形容詞能修飾名詞，又能修飾動詞，如“高、低、遠、近、快、慢、……”等都有這種作用。在形容詞裏，只能修飾名詞不能修飾形容詞、動詞的，實在並不多。如果我們把前者歸入副詞，那麼副詞的範圍未免太寬，形容詞兼副詞的就未免太多了。

照第二種標準，把“高、低、快、慢、深、淺……”等歸入形容詞，是合理的。這種標準基本上是正确的，可是也有毛病，還應該加以補充。因為像“老、直、白、光、怪……”這些詞修飾形容詞、動詞跟修飾名詞的時候，詞義的確會有所不同。如“老哭”的“老”、“直鬧”的“直”，不論它的意義是不是從“老人”的“老”、“直線”的“直”引伸而來，它們的意義已有很大的差別。“快來看”的“快”誠然跟“快馬、快車”的“快”是一個意思，但“快來了”的“快”就顯然是另一個意思。同樣，“好難看”的“好”跟“好光景、好說好散”的“好”，意思也不一樣。王先生、呂先生對於這些應該怎樣處理沒有交代清楚。呂先生在他和朱德熙合著的《語法修辭講話》裏講到區分詞類的原則，說是地位不同，意義也不同的時候，一個詞屬於兩類^⑤，那末這些詞應該兼屬形容詞和副詞兩類。但是呂先生在《語法學習》中講到形容詞的時候，說形容詞“有些還能修飾別的形容詞”，如“好冷”的“好”^⑥，好像他又把這些詞仍算形容詞不算副詞，這是跟他自己提出來的原則不符的。

照第三種標準，把“滿（沒聽見）、老（沒工夫）、光（吃菜）、怪（好玩）、白（着急）、混（出主意）、直（忙）……”之類列入副詞，是比較妥當的。但還得注意不要讓

① 見黎錦熙《新著國語文法》174—175頁。

② 見王了一《中國語法綱要》44頁，呂叔湘《語法學習》7頁。

③ 見王了一《中國語法綱要》48頁，49頁，《中國語法理論》31頁。呂叔湘《語法學習》6頁。

④ 見陸志章《北京話單音詞彙》《說明書》47—48頁。

⑤ 見呂叔湘、朱德熙《語法修辭講話》12—13頁。

⑥ 見呂叔湘《語法學習》6頁。

這類的範圍太寬。陸先生主張從寬處理，例如“亂(出主意)、空(說)、公(攤)、緊(跟着他)、遠(勝過他)、明(偷)、暗(搶)、渾(鬧)、傻(喫)……”等，也都算副詞^⑦。其實這些詞這樣用跟它修飾名詞時，在意義上並沒有什麼不同。如果我們同時按意義和地位二種條件來劃分詞類，要是詞義沒有顯著的改變，寧可還是不讓它變類。

讓我們把一般歸入形容詞和副詞這兩類的詞放在一起，分成幾組來比較一下，看它們的句法上的作用有哪些相同之處和不同之處。請看下表：

		作謂語	作補語	修飾名詞	修飾動詞	修飾形容詞
甲組	紅、綠、方、圓、長、亮、美、香、甜、偉大、古老	+	+	+	-	-
乙組	硬、近、遠、小、輕、重、明、暗、細、苦、亂、空、繁、單、純、孤、立、深、入、嚴、肅、圓、滿、殘、酷、熟、練、遠、全、面	+	+	+	+	-(1)
丙組	老、直、白、滿、怪、光、好、快	+	+	+	(+)(2)	-
丁組	不、也、還、再、又、都、就、只、僅、剛、且、可、倒、却、反、才	-	-	-	+	(+)(3)
戊組	很、太、最、頂、極、更	-	(-)(4)	-	(+)(5)	+

(1) 這組詞裏，有些有時放在別的形容詞前面，乍一看好像是修飾後面形容詞的，其實它們是並列的。例如“細長”是“又細又長”，“苦鹹”是“又苦又鹹”。

(2) 這一組詞修飾動詞的時候，意義跟修飾名詞的時候不同，這裏用虛線分開。但是裏面有一部分，如“好”、“快”，修飾動詞時，意義或變或不變，所以這裏虛線上下都作正號，但上面的加一個括號，表示非全體如此。

(3) 除“不”外，只修飾作謂語的形容詞。
(4) 只有“很、極”能作補語。
(5) 只修飾一部分動詞，如“愛、怕、喜歡……”等。

從上面的表裏可以看出，甲組的詞能作謂語、補語，能修飾名詞，但不能修飾動詞、形容詞；丁、戊兩組的詞恰好相反，這兩組詞具有顯然不同的語法特點，應該分別歸入兩類。丙組有時表現和甲組相同的特點，有時表現和丁、戊兩組相同的特點，可是在這兩種情況之下，它們在意義上也有顯著的變化，因此應該讓它們兼屬兩類。比較為難的是乙組，這一組詞具有甲組的特點，同時也具有丁、戊組的一部分特點

(修飾動詞，但是不修飾形容詞)。如果我們用修飾名詞和修飾動詞來作區別形容詞和副詞的標準，這一組也得要兼屬兩類。但是這一組詞的情形跟丙組不同，它們修飾動詞的時候跟修飾名詞的時候，詞義上沒有顯著的變化。這一組的數目又最大，比其餘各組要多得多，而且正在擴展中。有些複音的詞過去只能修飾名詞，現在却往往也用來修飾動詞(把“的”寫作“地”)，例如“正確地說，孤立地看問題，不要單純地估計敵人的弱點，熟練地駕駛着機車，小心地工作着，反動派殘酷地統治着人民……”這樣的用法一天天增加起來了。有些複音的形容詞從前修飾動詞的時候，習慣上是用來作補語，如“把屋子打掃乾淨”，現在也常拿它作修飾語，例如“徹底地、乾淨地消滅反動勢力，生動地描寫了勞動人民的生活，過分地打擊了他的情緒……”等等，因此，如果讓這一組詞兼屬兩類是不恰當的。如果換一種劃分法，把能作謂語、補語，能修飾名詞的劃在一邊，不能這樣用的劃在另一邊，這兩個詞類就能劃得乾淨得多。這樣，乙組的詞就歸入形容詞，只有丙組兼屬形容詞和副詞，而這組的詞是不多的。至於乙組的詞能修飾動詞，那可以把它當作多數形容詞的語法特點之一來說明。

關於重疊的副詞和形容詞，也須要特別提出來說明一下。王了一先生說：“同樣的兩個形容詞重疊起來，該認為副詞。因為這種疊字詞是從來不用為次品的”，如“好好、悄悄”^⑧。王先生的話不完全正確。“悄悄、漸漸、略略、稍稍、剛剛、白白……”這些詞不能用為所謂“次品”，因為它們原來就是由副詞重疊而成的，把它們算副詞是沒有疑問的。由形容詞重疊成的副詞，只有“明明、暗暗……”是像王先生說的那種情形。“好好的、高高的、輕輕的、大大的、遠遠的、恭恭敬敬的、暖暖和和的……”之類，就都能修飾動詞又能修飾名詞，並且常作謂語和補語，按照上面規定乙組的原則，是該算形容詞的。至於像“慢慢的、早早的……”幾個詞，確實有點特殊，它們能修飾動詞不能修飾名詞，這固然是和一般形容詞不同的地方，可是它們也常作補語，如“走得慢慢的、來得早早的”，又是一般副詞所沒有的功能，所以仍然該算形容詞。

總起來說：

- (1) 形容詞的主要作用是作謂語，作補語，修飾名詞。多數形容詞也能修飾動詞。
- (2) 副詞的主要作用是修飾動詞和形容詞。副詞

⑦ 見陸志章《北京話單音詞詞彙》
⑧ 見王了一《中國現代語法上冊》280頁。

不能作謂語，不能作補語(除“很、極”)，不能修飾名詞。

(3) 有些詞用它的一種意義的時候能作謂語，能作補語，能修飾名詞；用它的另一種意義的時

候能修飾動詞和形容詞，這些詞又屬形容詞又屬副詞。

我認爲這樣區分形容詞和副詞是比較恰當的，希望同志們指教。

關於形容詞的範圍

劉靜文

呂叔湘先生和黎錦熙先生在劃分詞類上有很多不同之處。有呂氏的劃分法較黎氏爲勝的，如黎氏代名詞和指示形容詞、疑問形容詞、疑問副詞在功用上很相近，分屬三個詞類有點近於割裂，呂氏合併成代詞一類，學習起來較爲方便。但是也有呂氏的劃分法不及黎氏的，如把性態副詞併入形容詞就是一個例子。

呂氏把黎書的指示形容詞和疑問形容詞併入代詞，這似乎把形容詞的詞性簡單化了。但他一方面把數詞列入形容詞大類之內，另一方面又把黎書的性態副詞併入形容詞，這就又使得形容詞成爲一個複雜的詞類了。如果把形容詞類下的數詞和名詞類下的副名詞合成數量詞，那麼，名詞和形容詞兩類的詞性豈不都顯得更爲簡單明瞭？《語法講話》把數詞與量詞(副名詞)合成數量詞；把指示形容詞和疑問形容詞列入指示詞；另把形容詞和性態副詞分開：這就使得形容詞的詞性單化了。怎見得《語法講話》是把形容詞和性態副詞分開的呢？因爲它說：“形容詞是表示事物的性質的，都可以放在名詞前面，修飾名詞，如‘大風、紅旗’、‘英明領袖’、‘正確理論’”。它又說：“許多形容詞也可以是副詞，如‘深入淺出’、‘精打細算’、‘老實說罷’。”把呂書的形容詞與《語法講話》的形容詞比較一下，就知道前者的詞性並不單純了。不單純的根本原因，還是由於形容詞和性態副詞的合併。

呂書把性態副詞併入形容詞，故認爲形容詞有修飾名詞、形容詞、動詞三項功用。其實它有五項用法：一、附加名詞(如真人真事)，二、附加形容詞(如真厲害)，三、附加動詞(如真打假打)，四、附加代詞(如真這麼幹)，五、附加副詞(如真不好)。依照呂書，形容詞一方面可以修飾名詞，另一方面又可以修飾形容詞和動詞；但這兩方面所需要的修飾語常是不一致的。例如“紅”、“綠”、“美”、“醜”、“富”、“弱”、“寒”、“暖”、“圓”、“方”、“偉大”、“燦爛”等詞都只能修飾名詞，不能修飾形容詞和動詞。“軟”、“硬”、“高”、“新”、“快”、“慢”、“輕”、“重”、“正確”、“猛烈”等

詞都不能修飾形容詞。只有例外的詞如“真”、“假”、“大”等可以有呂書所列的三項修飾功用。由此可見，呂書雖把形容詞和性態副詞合併，但在實際使用時仍和未合併時一樣。而且形容詞下帶“地”，一般已把它們作爲專用來修飾動詞的副詞，即呂書中也有“慢慢地走”、“好好地說”、“正確地說”的例子。現在雖把它們列爲形容詞，但它們對於名詞和形容詞並不發揮修飾的作用。把形容詞和性態副詞合併在一起，不但未能簡化詞類的區分，卻反而影響了漢語的精密性。

因爲在性態副詞中，一部分固然與形容詞屬於相同的詞義，如“真、假、快、慢、長、短、大、小、軟、硬、輕、重、濃、淡、冷、熱”等；但另一部分性態副詞，雖與形容詞同屬一個字，然而二者的詞義並不一樣。例如“真是，種(麥子)也是白種，要不跑，怎麼也是個死！”(《新兒女英雄傳》2頁)。在這句話裏，副詞“白”字含有“空、徒”的意思，與“白紙”的“白”字這個形容詞意思全不一樣。又如“一個是燕燕她媽，說死說活嫌敗興，死不贊成；一個是民事主任，死不給寫介紹信。”在這句話裏，兩個副詞“死”字含有“硬(不)”、“決(不)”、“總(不)”的意思，和“死”這個形容詞的意思也不同。再如“窮追”的“窮”(盡力地)和“窮人”的“窮”(貧苦)，“老想回家”的“老”(總是、常常)和“老人”的“老”(年紀老)，雙方的詞義都不一樣。其他可以類推。假如有性態副詞的話，那我們就可以把副詞性的“白”、“老”等歸到副詞類裏，與形容詞性的“白”、“老”等無關。但因呂書是把形容詞和性態副詞合併的，於是“白種”的“白”就與“白紙”的“白”合成一個詞了。呂朱合著《語法修辭講話》一講三段有“一個詞的意義不變的時候，儘可能讓它所屬的類也不變”的話，但是對於兩個意義不同的詞，爲什麼又把它們合成一個詞呢？

另如“大水滿臉都紅了，咧着個大嘴只是笑”(《新兒女英雄傳》206頁)，這兒的“滿”字是一個含有“全”的意思的形容詞。但如“這糖滿甜的”，這個“滿

就是含有“頗、很”意思的副詞。又如“好花”、“好人”的“好”和“天氣好(頗、很)涼呀”的“好”，“怪人”、“怪事”的“怪”和“天氣怪(頗、很)冷的”的“怪”，意思全不一樣。其他可以類推。副詞性的“滿”、“好”、“怪”都不是性態副詞，而是表明程度的副詞。《語法學習》把副詞性“好”字列入形容詞，如該書六頁所舉“好冷”的例子。《語法修辭講話》把副詞性的“怪”字列入形容詞，如該書一講二十七頁所舉“怪好看的”的例子。準此推論，副詞性“滿”字也該列入形容詞。但它們都是表明程度的，並不是“性質和狀態的名稱”(《語法修辭講話》一講十三頁對於形容詞所下的定義)。現在把它們列入形容詞，就使得形容詞的詞性不單純了。

總結以上所談，我們總覺得呂書形容詞的詞性頗

爲複雜。要使形容詞的詞性單純化，最好把它專用來修飾名詞；另把表明性態或程度的副詞仍劃入副詞類中。因爲在呂書的形容詞一類中，有些只能修飾名詞，有些能修飾名詞和動詞而不能修飾形容詞，有些又專用來修飾動詞。在這一類之中，而有各種不同的用法，這叫初學者怎能辨別清楚呢？而且代詞一類的詞性已經相當複雜，就不必再把形容詞類的詞性也弄得這樣複雜。我們另主張把代詞類放在名、動、形、副四類詞之後，因爲有些代詞代替了名詞，有些代替了動詞，有些與形容詞的功用相當，有些與副詞的功用相當。只有把代詞類放在那四類詞之後，才容易使初學者辨別代詞的各項用法。

怎樣改善寫字的技術

陳光堯

就現行的漢字來說，無論大人或小孩，在初學寫字時，總是直線形的橫筆直筆比曲線形的斜筆彎筆要好寫得多。斜筆彎筆在初學寫字者的手裏簡直不知道應該如何安排才好。我們看了小學生的習字本等等，就會感到寫漢字這件事情對於無數的兒童真是一種痛苦。

甚麼是橫筆直筆呢？如“王日出田車昌區單”等字就可以做代表。甚麼是斜筆彎筆呢？如“及互互瓦多夙飛派”等字中的一部分筆畫就是這種筆畫。以上就是就楷體漢字舉例來說的。如果說到行書，那每個字裏頭都有不少的斜筆彎筆存在；至於草書，就幾乎全是斜筆彎筆了。

但是等到字寫會了或寫得比較熟了些以後，一般地說來，却又是曲線形的斜筆彎筆比直線形的橫筆直筆要便利快速得多。特別是斜筆彎筆的一筆，就可能代替原字中的好幾筆或十多筆。例如“ふさめり”等字，就是用一兩筆代替了原字的很多的筆畫。而且這些字在一般稍會寫字的人手裏，多半都是會寫的。這也就是他們已經有了很雄厚的社會基礎，是誰也不能否認的事實。

如果我們採用了拼音文字，那字母只有幾十個，學習起來當然很容易；所以那不好寫的斜筆彎筆，也因為字母規律化了的關係，就變成很好寫的了。漢字因為字數太多，寫法的變化也多，學習斜筆彎筆不如

學習寫拼音字母那樣容易，這確是一個大缺點。不過，這缺點是可以利用書寫漢字的一部分規律來克服的，如認爲絕對困難那就錯了。

又如速記符號在記錄上所以能趕上發言人講話的速度，不使有所遺漏，除了它特有的某些標音技術和省略符號以及速記員本身的熟練能力等等而外，它的記錄符號完全是用的曲線形的斜筆彎筆，沒有一點兒垂直形的豎筆，這也是它所以能够迅速記錄的一個主要原因。

根據本年七月份出版的第39期《速記月報》報告，北京亞偉速記學校最近一屆畢業的學員，最高記錄速度是每分鐘248字，也就是說每秒鐘能記錄四個字強，這速度要算是很快的了。但是假定叫同一個人經過同樣的學習時間，却用一種完全是橫筆直筆的速記符號來記錄(這簡直是不可能的)，那他在每分鐘內一定記錄不了二百多個字。

漢字雖不同於速記符號，而且也不同於一切的拼音文字，但是就“手拿着筆在紙上寫東西”一點來說，它們却同樣是一種寫字勞動。所以只要我們能想法把現行的常用漢字歸納成爲數量不多的“字根”(或稱“偏旁”，下同)，並且把它們的曲線寫法規律化了，那在學習和書寫上就都可以帶來很大的便利。

所謂“字根”，就是除了漢字原有的214個“部首”外，把許多字的“共同部分”都歸納起來。例如“清醴

介紹幾種簡單的語音學儀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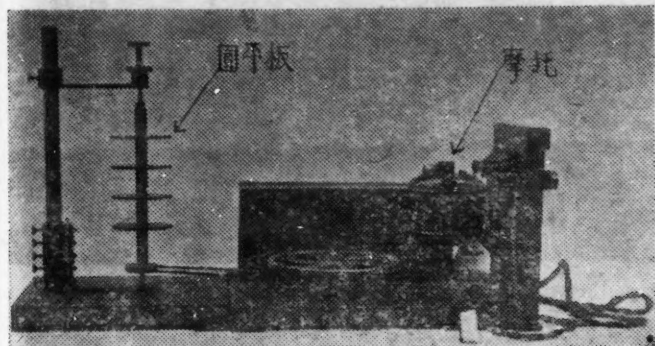
周 巖 福

我們爲了分析一般的聲音或說明聲音彼此的異同，假如專靠耳朵不能得到可靠的結果，就得用特製的儀器來幫助研究。儀器的種類很多，如果詳細的說明，應該屬於實驗語音學的範圍，現在只能就幾種容易得到而且容易使用的普通儀器，略作簡單的介紹。

(1) 齒輪發音器

我們知道聲音的高低是由於彈性物體在一定時間裏所發生的顫動數目的多少，顫動數多音就高，顫動數少音就低。爲了證明這一點，用齒輪發音器來說明是容易而簡便的。

齒輪發音器的一端，按裝幾塊齒牙數目不同的圓平板（假如按裝四塊圓平板：一塊是 96 齒牙，一塊是 72 齒牙，一塊是 60 齒牙，一塊是 48 齒牙），平板的圓徑都是相等的，平板和平板之間，相隔約 10 公厘—30 公厘的距離，串在一條直柱上。另一端按裝一個 $1/32$ 的小摩托，摩托與齒輪直柱用一條皮綫相連接。電流通過摩托時，摩托旋轉，同時帶動齒輪也旋轉。這時幾個齒輪的旋轉率是相等的。然後用一塊硬紙片或薄金屬片和齒輪輕輕相接觸，這時我們便可以聽到齒輪發出來的聲音。各個圓平板的轉數雖然相同（表示在一定時間，同樣快慢），但是齒牙的數目各異（表示顫動數多少不同），因此得出來的聲音有高低的不同。這說明了聲音的高低是由於發音體的顫動數不同構成的（見圖一）。



(圖一) 齒輪發音器

(2) 濁音計

濁音計是一件表示聲帶顫動不顫動的儀器，用來試驗輔音帶音不帶音。它的構造非常簡單，將一塊寬

約 15 公厘，長約 8 公分的金屬片裝在一條長約 10 公分的木柄的一端，同時再將一個一端繫有小銅鈴的彈性的鋼條（寬約 2 公厘，比金屬片短一些），插在金屬片與木柄相接的地位，小銅鈴和金屬片相貼。（見圖二）



(圖二) 濁音計

試驗時，把金屬片貼在喉頭的左邊或右邊，要是發不帶音的輔音，小銅鈴寂然不動；要是發帶音的輔音，小銅鈴便鏗鏘地響。

(3) 漸變音高管

構成聲調的要素主要是音高和音長，同樣的音高或音長屬於同一的調類。這個調類和那個調類的距離，如果相差較遠時，用經過訓練的耳朵去分辨，是可以辨別出來的。如果要審辨一個調類究竟高到什麼程度，或低到什麼程度，有時就得用儀器的幫助才能辨析得準確。

漸變音高管，是以彈簧片爲發音體的金屬製成的笛子，有一個可以伸縮的金屬方棍：一端接觸在彈簧片上，調節彈簧片顫動部分擴大或縮小，在彈簧片後面還有一塊金屬片，節制共鳴器的大小。因之可以發出高低升降的聲音來；一端作針狀伸出笛外，它指着金屬製的一塊弧形的板，這塊金屬板可以左右推動，上面刻有音階名和度數。模仿某一調子時，一方面用口吹笛子，一方面用手活動金屬板，再一方面用耳朵聽對方的發音。到了笛子和發音相同時，再看那指針所指的音階名，這音名就是對方所發的調子的高低（見圖三）。



(圖三) 漸變音高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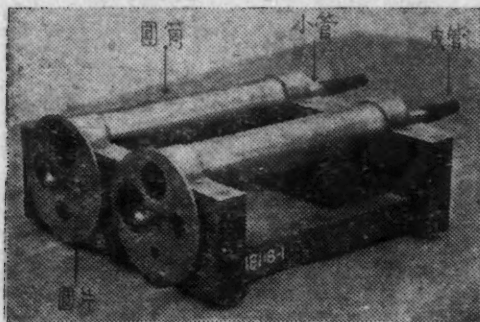
(4) 共鳴筒

人類發音器官的口腔和鼻腔，是發音體的共鳴

器。因為共鳴器的種種變化，也就產生種種不同的音質。共鳴筒就是為說明這一點的。

共鳴筒的構造並不複雜，它的外形是一個圓筒，中間是空腔兒的，一頭兒開着，一頭堵塞。堵塞部分的中間，留有小孔，在小孔的通道有一根較圓筒稍長的小管，管的一端安上一個跟圓筒裏口大小相當的活塞，活塞的中間有一個簧片的笛子。管的另一端裝上一段皮管，使與口部相接。圓筒中間的小管可以在筒內拉出推進。圓筒開着的一頭兒，按裝着一個帶有幾個大小不同圓孔的圓片，可以以小孔正對筒口，也可以變換大孔正對筒口。

在皮管的這一頭兒吹氣，活塞那頭兒的簧片發生一定音節的樂音。小管後撤，帶動着活塞後退；小管



(圖四) 共鳴筒

來。這個伸縮變換，就是代表口腔深淺的不同。要是圓筒前面帶有大小不同圓孔的圓片變換了，雖然活塞固定在某一點上，得出的聲音也各有不同，這說明因口腔開合的不同影響音質的不同(見圖四)。

(5) 假 顎

舌頭在口腔裏的動轉非常靈活，每一移動便得出一個不同的音來。我們為了表現舌頭和上顎接觸的部位，一般用假顎來試驗。製造假顎的程序：先將臘膏泡軟像牙醫師安假牙時所用的臘膏一樣，把試驗人的口蓋形狀托出來，然後根據這個口蓋的形狀製成鐵模(見圖五甲)或石膏模，再根據模子的形狀，用薄金屬



(圖五甲) 口蓋鐵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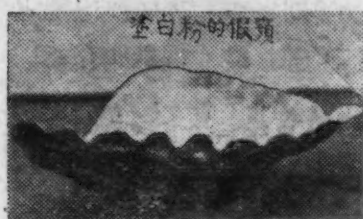
片或濾紙作原料，軋成一個一個的口蓋模型。用濾紙作原料時，先將濾紙浸在明膠液一類有黏性的東西裏，然後再一層一層貼在鐵模或石膏模上，晾乾後即可應用。但必須特別注意，無論用薄金屬片或用濾紙

作原料，越薄越好，免得在口腔中發生較大的障礙。

試驗的時候，把假顎的裏面塗上容易蹭掉的粉末，如果假顎是白地兒，塗上黑粉(見圖五乙)如果假顎是黑地兒，塗上白粉(見圖五丙)。總之，假顎的地兒和所塗的粉末必須要用容易辨別的顏色，免得混淆不清。試驗某一音時，舌頭所接觸的某一部分，就會把粉末蹭掉，很清楚的現出舌頭所碰到的上顎某一部位，然後輕輕的取出，萬不可蹭掉任何部分的粉末，以免混淆。取下後，用照像或繪圖的辦法，把那舌印照出或繪出，這樣便可以清晰的辨明舌頭與上顎接觸的部位了。



(圖五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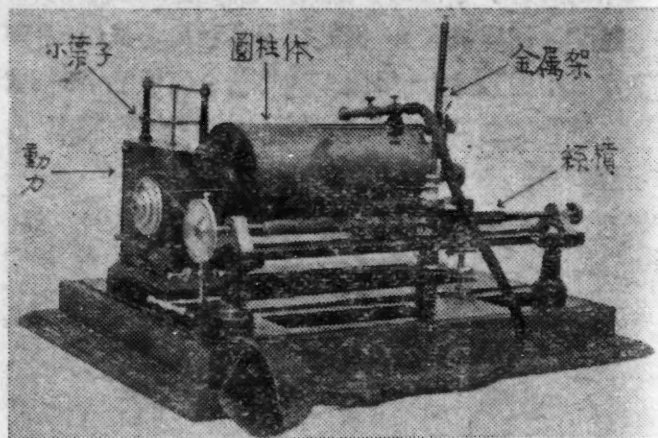
(圖五丙)

的上顎某一部位，然後輕輕的取出，萬不可蹭掉任何部分的粉末，以免混淆。取下後，用照像或繪圖的辦法，把那舌印照出或繪出，這樣便可以清晰的辨明舌頭與上顎接觸的部位了。

(6) 浪紋計

浪紋計是利用薄膜鼓動表現聲音的儀器，它可以試驗聲音的長短高低強弱和輔音清濁，是試驗四聲最簡單而又能得到較正確結果的儀器。它的發生，應從生理學家發明薄膜鼓動作用的時候算起。它是經過了漸次的改善，才利用到語音學實驗上來，然而它的原理還是根據薄膜鼓動的作用而造出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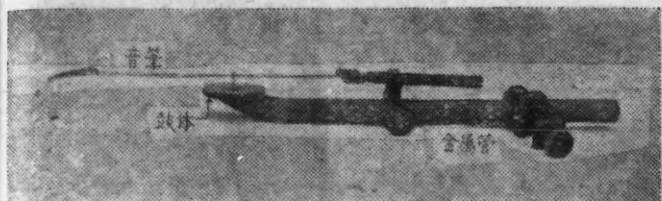
浪紋計的式樣很多，有橫置的，有豎置的；有用電力發動的，有用發條發動的，也有用垂錘發動的，



(圖六甲) 浪紋計

雖然方式不同，而所需要的根本機件，却是一致的。大體的輪廓：裝置一個動力(電力、發條或垂錘)，動力上安兩片像風扇的小葉子(如果是電力的可以用電流節制快慢)，節制旋轉的速度。動力旁連接一個金屬圓柱體，它隨動力轉動而轉動。圓柱體前有一條絲槓，絲槓也和動力相連。絲槓上豎着一個金屬架，架

上裝置音筆、音叉等零件(見圖六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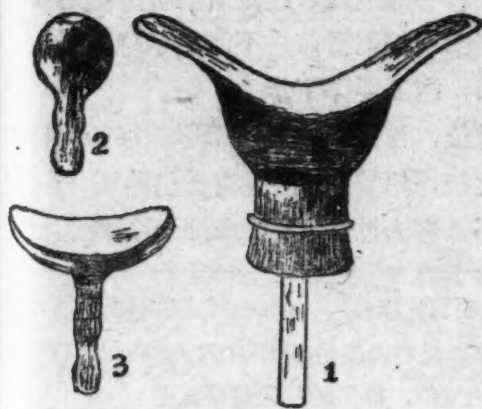
(圖六乙) 音鼓

在介紹浪紋計使用法以前，先得介紹浪紋計上幾樣不可缺少的附屬零件：

①音鼓 音鼓是浪紋計上很重要的一個機件。一根圓徑約5—10公厘，長約15公分的金屬管，一端通連扁平形的“鼓體”，鼓體上蒙着一層薄橡皮或薄雲母片，一端連接膠皮管，膠皮管通連着收音器。鼓體上蒙膜的中間兒黏着一枝音筆，音筆桿是用輕金屬或麥桿做成的，音筆尖是用薄紙或鉛片製成的。(見圖六乙)

②收音器 收音器是傳達聲帶的顫動到音筆上去的器具。它和接在音筆上皮管的另一端相連接。當發音的時候，收音器裏的空氣，隨着聲帶的顫動也同樣發生顫動，這個顫動經過金屬管傳達到音鼓，黏在音鼓上的音筆也發生顫動，然後就可以把這顫動畫在浪紋計的圓柱體上。

收音器有許多形式，試驗哪一部分的聲音，就用哪種收音器。比方試驗由口裏發出的聲音，就用“收音口罩”，收音口罩一般是用輕金屬製成的，用硬紙或厚布裱糊也可以，試驗時把它罩在嘴上。試驗鼻音時用“鼻球”，鼻球是用玻璃製成的，它的大小以試驗人鼻孔大小而定，試驗時把鼻球放在鼻孔裏。試驗聲帶顫動不顫動用“聲帶斗”，聲帶斗像個量東西用的小漏斗，是用金屬製成的，面上蒙有一層薄膜，試驗時薄膜貼放在喉頭的左邊或右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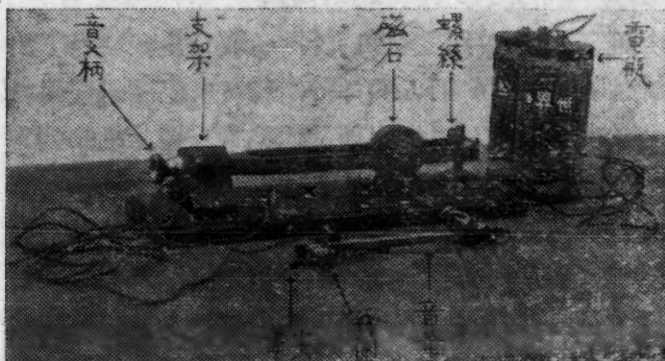
1. 收音口罩 2. 鼻球 3. 聲帶斗

(圖六丙)

而且它的顫動頻率是固定不變的(如果是100顫動的音叉，每秒鐘便得出100顫動)，它對於計算浪紋計的速度和推求語音浪線的高低，是不可缺少的標準尺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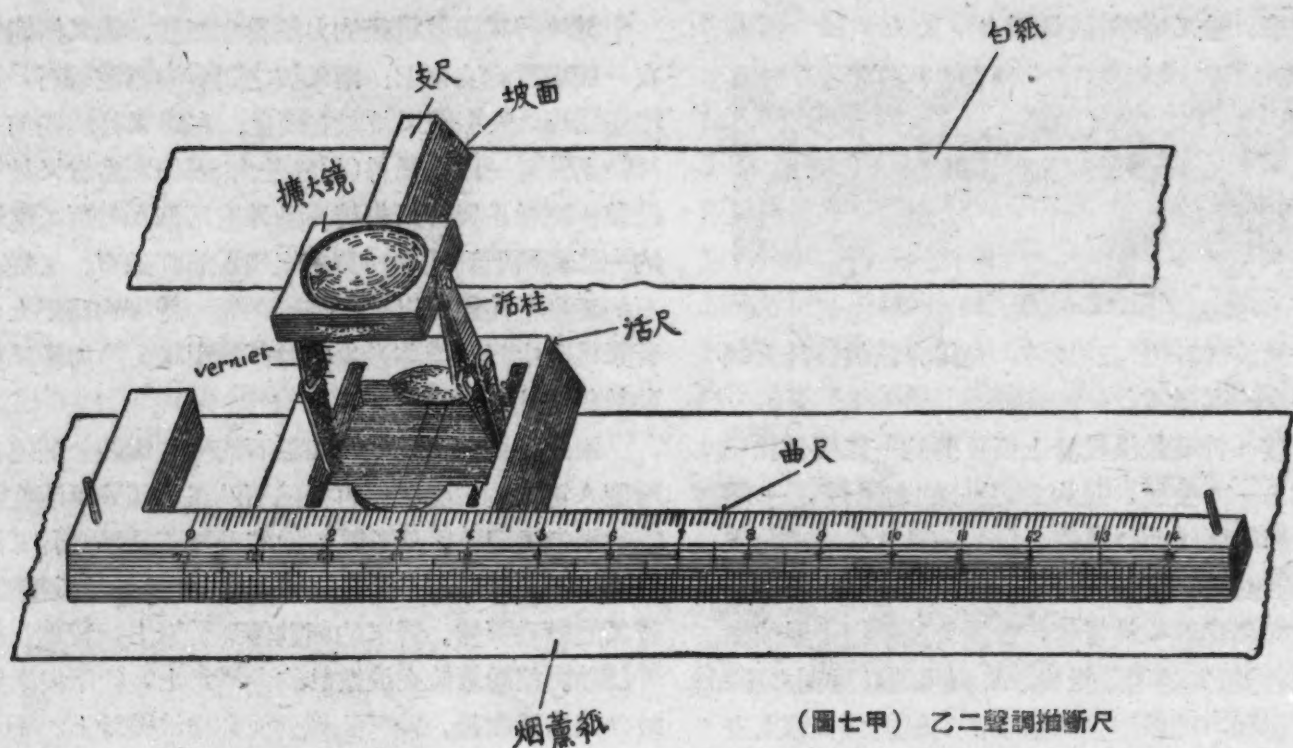
電流音叉藉着電磁的力量發生顫動。音叉柄固定在一個鐵質的支架上；兩叉枝之間有一座電磁石，電流通過時，吸引音叉枝左右顫動；在兩叉枝的任何一叉枝上裝置一段金屬絲(最好是白金絲)，在這叉枝旁邊裝一螺絲，與音叉相接。另外有兩個A電瓶，電瓶的一條綫頭通到螺絲，另一條綫頭通到磁石。又從磁石的正副極接頭處出來兩條綫，通到音筆的綫圈上，音筆綫圈中間的鐵芯發生磁力，吸引筆尖作與音叉顫動數相同的顫動週率。

用的時候，先把螺絲和磁石的兩條綫頭分別連在兩個A電瓶的陰陽極；再把磁石的正副極分別連在音筆的兩個綫圈上。然後輕輕的敲動一下音叉，音叉便發生顫動。這時用手捻動螺絲，使與金屬絲稍微接觸，音叉便顫動不休。音叉的顫動傳到音筆上，音筆也隨着顫動。把音筆裝在浪紋計的金屬架上，使筆尖與浪紋計圓柱體相接，音叉的顫動便畫在浪紋計上。不用時，只要用手摸一下音叉，或把螺絲捻到與金屬絲有了相當的距離，音叉顫動即行停止。(見圖六丁)



(圖六丁) 電流音叉

我們明白了音鼓、收音器和音叉的作用和使用法之後，對於浪紋計的試驗方法就容易瞭解了。試驗浪紋計時，先用光滑白紙圍在圓柱體上。把接口的地方用膠黏住，然後用臘燭的黑烟把圓柱體上的紙薰黑。再把音叉的顫動畫在烟薰紙上。我們知道音叉的顫動數是固定的，假如是每秒顫動100次的音叉，那麼在烟薰紙上每表現100顫動便是佔用一秒鐘的時間，這樣，便可以求出圓柱體的旋轉速率和均勻的程度了。把音鼓裝在圓柱體前的立柱上，音筆尖和烟薰紙相接，語音從收音器經過皮管傳到音筆尖，語音的聲浪就清楚地畫在烟薰紙上，從烟薰紙上的浪紋可以粗略的看出這音和那音高低、長短、強弱的差別來。要想求得每個音的絕對音高，還須要用“聲調推斷尺”來測量，單靠浪紋計是不行的。我們收完音以後，把烟薰紙取下，在明膠液裏浸過一道，晾乾後紙上的黑烟子就可固定，好像照像定影的辦法一樣。



(圖七甲) 乙二聲調推斷尺

(7) 乙二聲調推斷尺①

研究聲調，實際就是研究音高的起落。我們有了浪紋計收下來的烟薰紙上的材料，就可以根據這些材料作一番推斷功夫，以求得聲音的絕對音高。推斷的方法有種種不同，但是它們的原理都不外乎就浪紋計旋轉的速度，以推斷語音中各顫動的快慢②。因為聲音高低的進行法是依2數遞進的，所以得出了各顫動在每秒鐘的數目，還要依這些數目求出它們的對數，按照對數來作圖③。若不問聲音的實際，只用顫動數作圖，它的數可以大到無窮或小到無窮，不能將音高正確表示出來。

乙二聲調推斷尺是根據幾種推斷方法裏的一種製造成的，既靈巧又省時間。不過有個必要的條件：浪紋計的旋轉率必須具有相當平均的條件，才能使用這件儀器。浪紋計不具備這個條件時，用乙二聲調推斷尺推斷音高就不能得到正確的結果。

乙二聲調推斷尺的構造：一枝很簡單的小曲尺，尺的正面和坡面都刻着0—140公厘尺度。還有一個方形的底座（稱為活尺），座下鑲着一塊厚明角片，片的中間刻有兩條相距2.5公厘的紅綫。底座的左上角伸出一支約40公厘長的坡面小尺（稱為支尺），和底座左邊成一條直綫，支尺的坡面上刻着對數綫。底座上面裝着一個八倍的擴大鏡，用兩個活柱支着，用時支起，不用時可以疊入底座當中。底座左角上部刻有10:9 Vernier④。全部重量約五市兩，摺疊起來可以放在口袋裏攜帶（見圖七甲）。

工作的時候，先把小曲尺固定在木板上；把活尺上的擴大鏡支起，支尺伸直，在支尺下面放一條白紙，紙也固定在板上。活尺和小曲尺緊貼，把要推斷的某音的烟薰紙放在明角片下。明角片的右紅綫對準烟薰紙上要量的聲浪的第一浪的開端，在支尺的坡邊畫一直綫，做為起點。然後用左手把活尺向右推，推到左紅綫正對第一浪的開端，這時數數兩條紅綫之間共有多少聲浪，如果有6個聲浪，就在支尺對數綫表示6的地方用鉛筆注一點。如此的再往右推，把左紅綫推到右紅綫的地位，再數兩綫之間的聲浪數，再做點。按照這樣的手續一直作到末一浪為止。作完，在支尺坡面畫一條直綫，做為終點。兩條直綫之間的各點，用鉛筆聯結起來，成為一條曲綫，就是這個音的起落綫。這條曲綫，只能表示相對音值，不能表示絕對音值，要表示絕對音值，還須要作下步的手續。

表示絕對音值，首先應該知道烟薰紙每秒鐘行走的速率。知道之後，用特製的“絕對音值曲綫片”（見圖七乙）畫出，不必再去推算。假如烟薰紙每秒鐘行走

① 見《乙二聲調推斷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四本四分。這件儀器是劉復（牛農）發明的，我們曾經用它做過不少的工作，得出的結果都很正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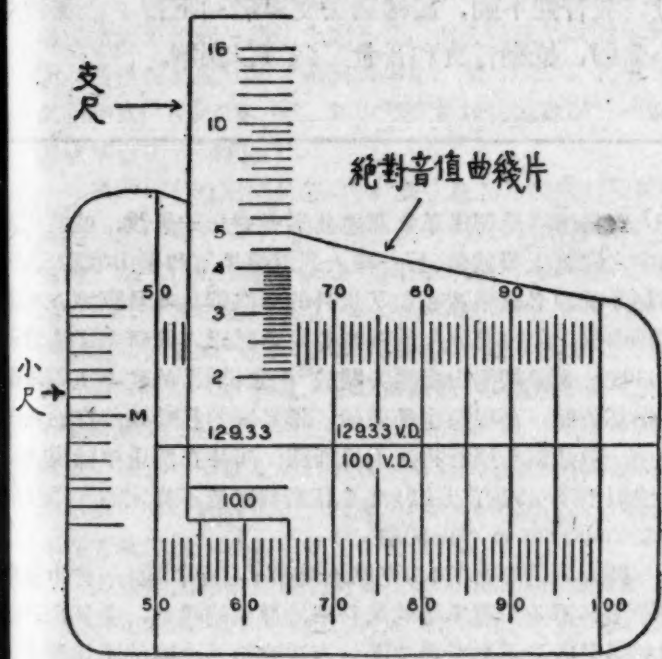
② 參見劉復《聲調之推斷及“聲調推斷尺”之製造與用法》，《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一本二分，132頁。

③ 關於為什麼要用顫動數的對數來作圖，參見劉復：《四聲實驗錄》，40—47頁。

④ 關於Vernier的用法，參見劉復《乙二聲調推斷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四本四分，355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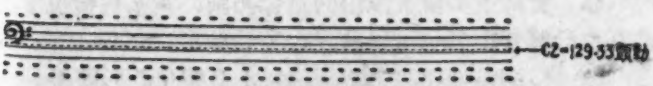
65 公厘，而我們所取的音高標準是 $C_2=129.33$ 顫動，那麼就把支尺坡邊表示 129.33 顫動處和片上表示 129.33 顫動處相對成一條直綫，同時支尺坡邊和片上表示 65 的地方成一條垂直綫，這時支尺坡邊的 5 和片的上邊恰好相交，我們就在這相交處注一點，稱為 M 點。這意思是說：烟薰紙每秒鐘行走 65 公厘，兩條紅綫之間包括 5 個浪時，它的音高為 $C_2=129.33$ 顫動。所推斷的音的開始和末了兒，各作一個點，再把兩個 M 點聯成一條水平綫，稱為 MM 水平綫，這條綫表示的音高是 $C_2=129.33$ 顫動，再按照片左所附的小尺，在綫上下各聯結平行綫七條，每條綫的代表音值是：

$C_3=258.65$ 顫動	$B_3=244.14$ 顫動
$A_3=217.50$ 顫動	$G_3=193.77$ 顫動
$F_3=172.63$ 顫動	$E_3=162.94$ 顫動
$D_3=145.16$ 顫動	
(MM 綫) $C_2=129.33$ 顫動	$B_1=122.07$ 顫動
$A_1=108.75$ 顫動	$G_1=96.89$ 顫動
$F_1=86.31$ 顫動	$E_1=81.47$ 顫動
$D_1=72.58$ 顫動	$C_1=64.66$ 顫動



(圖七乙) 絕對音值曲綫片

有了 $C_2=129.33$ 顫動，上下的水平綫，就可以根據水平綫製成五綫譜。(見圖七丙) 把語音曲綫上所求出



(圖七丙) 語音五綫譜

的 MM 綫和五綫譜上代表 $C_2=129.33$ 顫動的一條綫覆合，按照小學生“寫照格”的辦法把語音曲綫描在五綫譜上，這個聲音究竟高到那個音或低到那個音，就

可以從五綫譜上看出來了。

(8) 磁性錄音機

我們在搜集語言材料時，爲了節省時間而能得到豐富、真實的材料；或是研究某一種語言，需要返復的聽辨，用磁性錄音機最爲方便。

通常所用的磁性錄音機，外表的樣子有種種形式，所用的錄音材料雖有鋼絲和磁帶的不同，但機件的構造和錄音的原理是一樣的。(見圖八甲)



(圖八甲) 鋼絲錄音機的一種

錄音鋼絲是一種含有鉻 18%、鎳 8% 的不銹鋼合金，直徑約 .004 吋，具有每方吋 245,000 磅的抗張強度，錄音或放音時鋼絲盤走的速度是每秒鐘約 24 吋。磁帶是一種有韌性的紙或硝酸纖維等作底子，在一面上塗上一層磁性金屬，如氧化鐵等。帶寬約 1/4 吋，盤行速度在錄音和放音時每秒鐘約 $7\frac{1}{2}$ 吋。

磁性錄音方法，是將鋼絲或磁帶通過一塊電磁鐵，音週電流的電磁鐵的綫圈裏產生磁場，使鋼絲或磁帶不斷地被磁化。綫圈的音週電流是在不停地起着強弱的變化，鋼絲或磁帶也隨着這種強弱的變化造成了分子密度不同的強弱，這種強弱和音週相同，用眼睛是看不見的。



(圖八乙) 電磁綫圈

綫圈在磁性錄音機上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它用含鎳 50% 的鎳鐵合金片構造而成。分作兩組：一組是抹音綫圈，一組是錄音放音綫圈(見圖八乙)。

抹音綫圈的電能由一具超聲波振盪器供給，它是 30—50 kc 超聲波等幅電能，超聲波等幅電能所產生的磁場，將鋼絲或磁帶磁化，把鋼絲或磁帶上已錄音

的磁化分子，或未錄音的不規則磁化雜質完全變作超聲波等幅磁化載波，使鋼絲或磁帶的磁化分子全部作有規則的整齊排列。

錄音綫圈的電能由放大器供給，錄音時作輸出綫圈，鋼絲或磁帶拖過錄音綫圈，由音週電能將磁化載波加以調度，也就是將整齊的分子排列調度作音週磁化排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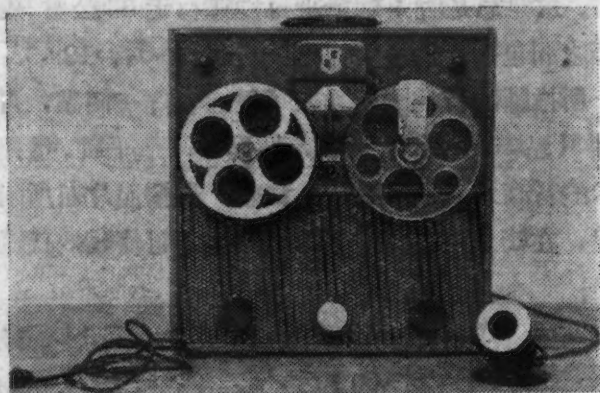
放音時，超聲波振盪器停止工作，抹音綫圈沒有輸出，錄音綫圈變作輸入綫圈做爲放音綫圈。當鋼絲或磁帶通過綫圈時，鋼絲或磁帶上的變化磁場立刻感應綫圈，產生音週電壓，輸送到放大器放大。

錄音時，錄音綫圈和抹音綫圈同時工作，意思就是先把原有錄音或錄音材料上不規則分子排列整齊，再把新音錄上，以免雜音太多。

我們再把磁場的來源說明一下，也就是把錄音和放音的過程重複一遍：當錄音時，話筒本身發生一種微弱的電流，經過放大後，再到強力放大和超聲波振盪器，這時電流傳到綫圈，綫圈便發生磁場，使在綫圈經過的鋼絲或磁帶作音週磁化排列。鋼絲或磁帶的音週磁化排列本來很弱，如果不用放大作用恐怕難以聽得清楚，所以在放音時要把鋼絲或磁帶上微弱的磁場先送到綫圈變作電流，電流傳到放大，再到強力放

大，但不經過超聲波振盪器，直達喇叭發音。

錄音機的表面上，裝置着幾個鈕，兩個交替傳動的盤子，一個話筒。當錄音時，先插上電源，把鈕撥指錄音地位，鋼絲或磁帶開始從一個盤子經過綫圈電磁石繞到另一個盤子上，同時把話筒插到放話筒的孔



(圖八丙) 膠帶錄音機的一種

內，發音人對着話筒說話，鋼絲或磁帶慢慢的旋轉着，聲音便錄在上面(見圖八丙)。放音時，先把鈕撥指放音地位，再把另一鈕撥指回轉地位，鋼絲或磁帶很快的返回原來盤上，有的錄音機在回轉時發生聲音，這時的聲音是反音。回轉完畢，再把回轉鈕撥指正轉地位，放音鈕不動，旋轉過去便可聽到正音了。聲音大小強弱，捻動音質和音量二鈕可以調劑。

(接 31 頁) 同時又偏重於古籍。他們在現代的漢語作品中又看不見漢字後面所掩藏着的活生生的雙音節和多音節詞，而對於整個漢語形成一種印象，認爲是單音節的語言，在漢語中全部單詞都是單音節的^④。他們既然混淆了詞和字，就談到漢語詞彙的貧乏，似乎漢語單詞的數量完全和漢字的數量相等，也就是不超過四萬個，而任何歐洲語言却都有幾十萬。從這種臆想的單音節詞理論出發，他們斷定漢語單詞是沒有形態變化的。同時對於“形態”一詞，他們常常不合理地理解得太狹窄，認爲只是單詞本身形態能夠在句子中起變化來表示和其他單詞之間的關係。因此就斷定漢語沒有形態學^⑤，而據說也沒有詞類，因爲在語言中劃分詞類似乎只能根據單詞本身形態能不能作各種變化來決定。

有了這樣一些理論以後，要引申到斷定漢語沒有語法就不困難了，而沒有詞類似乎也可以證明中國人的思想落後。這種錯誤，最初是由於研究方法不科學而產生的，後來在資產階級語言學界就爲了資本主義國家統治集團的利益而鞏固下來，更加深起來作爲帝國主義強盜侵略企圖的思想基礎。

馬爾完全採納了關於漢語詞彙係單音節並無形態變化及由此而來的漢語無詞類的理論，建立了臭名遠揚的階段論，並且根據這一理論把漢語列入世界上最古老、發展上最低級的語言。

資產階級語言學者的著作和錯誤的馬爾學說中所包含的關於漢語古老性的錯誤理論也出現在蘇聯漢學家的著作中。

有人堅持漢語單詞係單音節並無形態變化的學說，並且在詞和字之間劃上等號^⑥。另一些人則追隨馬爾和墨山寧諾夫，堅持劃分詞類必須根據在句子以外的形態變化並且斷定在現代漢語中保存着沒有分化的詞類^⑦。第三類人則研究了漢語單詞以後，企圖把墨山寧諾夫關於“概念範疇”的唯心主義理論來作爲依據，而根據這種理論，認爲詞的範疇雖然存在於語言中，但是似乎沒有語法上的區別；同時在漢語中發現甚至有些似乎不但沒有語法特性並且意義也是不肯定的單詞(分化詞 диффузные слова)^⑧。

斯大林同志在其《馬克思主義和語言學問題》一書中徹底摧毀了馬爾及其繼承者的反科學的捏造的理論，並且用研究個別語言的真正馬克思主義的方法武裝了蘇聯的語言學家。

(譯自 Б. Исаенко, Н. Коротков, И. Советов-чэнь 合著《華語課本》，莫斯科外國文書籍出版局，1954。)

④ 實際上即使古漢語的單音節詞，在某些情況下顯然是更古的雙音節詞中語根成分合併的結果。

⑤ 根據這種理論只承認詞類本身變化的形態學。

⑥ 這種觀點以 B. C. 考洛考洛夫爲代表。

⑦ 例如見 И. М. 奧沙寧 1946 至 1950 年的著作。

⑧ 例如見考洛特科夫的著作《關於漢語詞類和帶詞尾‘然’的副詞形成過程的問題》，1946 年莫斯科東方學學院作品選。

譯述



蘇聯《華語課本》中的漢語語法理論

蘇聯伊三克等著

明揚選譯

一 漢語單詞的結構

漢語詞彙的全部單詞分為兩類，即非派生詞和派生詞。非派生詞除很少例外情況外^①是單音節的並且在意義上不能再加分割。

大部分非派生詞都是從古代語言中繼承下來的。其中有很多早就見於中國上古文獻中，如：“人”、“水”、“火”等。這類單詞表示人們生活中的重要概念，在現代漢語中廣泛地使用着，並且還用作大量派生詞的基礎，也就是名符其實的根詞。非派生詞在口語中，特別在日常生活的口語中，佔重要的地位。其中大部分屬於基本詞彙，並且又佔基本詞彙的極大部分。然而在整個詞彙中大部分單詞屬於第二類，即屬於派生詞一類。派生詞可以由幾個都是有獨立意義的成分組成，如：“火車”。在派生詞的結構中也可以有輔助成分。輔助成分賦予單詞以語法上的特性，而有時候則改變單詞的實義。這種輔助成分即所謂詞頭詞尾，如“車子”，其中“子”是名詞詞尾；又如“第一”，其中“第”是加在基數詞“一”前面，構成序數詞的詞頭。

單詞中含有意義的部分(有獨立意義的部分和輔助部分)稱為詞素(морфема)。構成派生詞的詞素，其本身也可以是派生的，如“帝國主義”一詞由兩個詞素構成，即有獨立意義的成分“帝國”和相當於俄語-изм的輔助成分詞尾“主義”。第一個詞素相當於“帝國”這個單詞，其本身由兩個有獨立意義的詞素“帝”和“國”構成。第二個詞素是詞尾“主義”，相當於一個派生詞“主義”，由“主”(主要的)和“義”(原則)兩個詞素構成。單詞中有獨立意義的成分有時相當於現代漢語中的某個單詞，有時相當於古代漢語中的某個單詞，而目前在口語中在正常情況下這個單詞已不再使用。

非派生詞相當於我們前面所舉的單詞中所談到的那些詞素的，可以舉“火”和“車”為例。“帝”、“國”、“主”等詞只有在特殊的上下文中，或者在成語中^②，才能用作獨立的單詞。而古代的單詞“義”，作為一個現代漢語的單詞來看，是不存在的。

二 構詞法

漢語派生詞構詞法的主要方法是複詞組合法(словосложение)。用這種方法組成的單詞的各個組成部分之間的關係從表面上看來好像是句法關係，實際上和句法關係有本質上的區別，而完全是由單詞的詞法特性來決定的。

各種不同結構類型的單詞的例子如下：

1. 主從結構：“鐵路”、“合作”，
2. 聯合結構：“土地”、“父母”，

3. 動賓結構：“動員”、“投資”，
4. 動副結構：“打倒”、“刷白”，
5. 主表結構：“年輕”、“嘴硬”。

大部分的多音節詞都是由屬於主從結構的兩個部分組成的，雖然並非都是這樣：其中一個成分或兩個成分本身又可以是複合成分，如：“無線電報”一詞由“無線”和“電報”兩者組成。外來語僅在極少場合用音譯，一般用意譯，如“社會主義”。屬於各種不同結構類型的單詞具有不同的語法特性。

漢語在構詞法方面很少用下列各種構詞方式，如：重疊式(如“哥哥”)，如前面所舉加詞頭詞尾的方式和通過某些語法形式來造新詞的方式。最後一種方式的例子如：“打鐵的”(從“打鐵”變來)、“馬上”(由名詞“馬”加後置詞組成)等。

三 詞類

漢語有下列詞類：1. 名詞，2. 代名詞，3. 動詞，4. 形容詞，5. 副詞，6. 數詞。此外我們發現漢語還有下列主要的輔助詞和小品詞：1. 前置詞，2. 後置詞，3. 連接詞，4. 小品詞。分別論述如下：

名詞 漢語名詞沒有性的區別，沒有單複數和格的變化。名詞所表示的事物的數量在句子以外沒法肯定。漢語的名詞(除表示獨一無二的事物如“太陽”或表示物質的如“水”以外)不表示個別的事物而表示同一類事物的總體，有些像俄語的 дичь(野物)、рыба(魚)等等。

只有在句子中根據具體情況(知道在講誰講什麼)，根據上下文或在名詞前面加各種修飾語，才能肯定名詞所表示的事物的數量。用各種不同方式來肯定名詞所表示的事物的數量的例子如下：如“他是工人”，“他們是工人”，“學生很少”。在所有這些例子中，數量是用單數或複數的代名詞和數量形容詞來肯定的。

在肯定名詞的數量方面，最主要的方法是在名詞前面加數詞或是加帶有單位詞尾或不定複數詞尾“些”的指示代名詞，如：“一個人”，“這個人”，“這些人”，“這三個人”。在某些場合，例如在稱呼中，假如名詞不能用數量修飾語，則表示某種人的複數名詞可以在後面加詞尾“們”，如“同志們”。名詞的語法特性大部分決定於名詞在歷史演變過程中所形成的內部結構。由兩個詞素組成的名詞最常見的屬於主從結構，如：“鐵路”、“工人”等等。在日常口語詞彙

① 在漢語中不能再分為更小意義單位的多音節詞是極少的。

② 離開了上下文或不用在成語中時，同一概念用派生詞“皇帝”、“國家”、“主人”、“主要的”來表示。

中用詞尾“子”、“兒”等組成的名詞用得很廣泛，如“車子”，“花兒”。別種結構類型的名詞較為少見。由表示動作的詞素用聯合結構組成的單詞本身成為兩個同義詞：一個是名詞，一個是動詞。同是屬於這一類結構但是由表示人或事物的詞素所組成的單詞永遠只能是名詞，如“朋友”。動賓結構的單詞一般是動詞。然而有時候也會是名詞，如“革命”在現代漢語中的意思是“進行革命”或“革命”，而目前主要用作名詞。

在及物動詞後面或及物動詞連同其實語後面加形容詞詞尾“的”也可以構成名詞。在這種情況下，從及物動詞變來的名詞表示動作的對象，如“吃的”(可以吃的東西，食物)；而從動賓短語變來的名詞則表示其中動詞所指動作的主動者，也就是進行這種動作的人，如“打鐵的”。

名詞不論屬於那一種結構，如果意思上允許的話，都能用作其他名詞的修飾語，表示後一名詞的相應的品質。在這種情況下，雙音節的單詞按理要加詞尾“的”，如“鐵橋”，但是“木頭(的)房子”，一般可不用“的”字。然而如果沒有被修飾語，則屬於任何結構的名詞必須加詞尾“的”才能表示相應的品質，如“這座橋是鐵的”。

漢語的名詞在句子中的用法有某些和俄語名詞不同的地方。漢語名詞作為表語時，除很少例外，在前面一定要用繫詞“是”，如“他是學生”。名詞和否定詞“不”以及副詞不直接連用。在有表語的句子中副詞放在繫詞“是”前面，並且和“是”在發音上連讀，如“他不是學生”，“你也是學生”，“他們都是學生”。

在有動詞的句子中，名詞在句法上的作用決定於名詞在句子中的位置。一般如名詞在其他名詞之前，則是修飾語；在謂語之前，則是主語；在謂語之後，則是賓語。同時，名詞的形態不變(名詞不變格)。如果把名詞的位置倒換，則意義也倒過來，如“我們幫助人家”。“人家幫助我們”。

代名詞 漢語代名詞和名詞一樣不變格。第三人稱的人稱代名詞沒有性的變化。然而在文章中有時用不同的寫法：“他”和“她”。人稱代名詞的複數由加詞尾“們”構成，如“我”，“我們”。所有格代名詞是在單數和複數的人稱代名詞以及疑問代名詞“誰”後面加詞尾“的”，如“你”、“你的”、“你們的”，“誰”、“誰的”^①。

指示代名詞(“這”和“那”)用作修飾語時如果是單數則用單位詞尾(如“這個”、“那個”)，如果名詞表示不定量的複數事物，則用詞尾“些”(“這些”、“那些”)。某些代名詞的重要特點是這些代名詞能夠用來代替各種不同的詞類，或者用來代替在句子中起着各種不同作用的一種詞類，如“這是什麼？”其中“什麼”是表語；“這是什麼人？”其中“什麼”是表語的修飾語。

動詞 漢語的動詞沒有人稱、數、性、時態的變化，但是有體(вид)的變化。動詞的體的變化部分地肯定了動作的時間。動詞各種不同的體的意味可以通過加詞頭詞尾來表示，也可以通過不加詞頭詞尾來表示，和俄語動詞的體有本質上的區別。應該記住，在肯定句中動詞用原來的形態(不加詞頭詞尾)表示動作的經常性、習慣性、說話當時的行動、願望、進行這一動作的決心等，如“我抽煙”可以指“我(一般)抽煙”，“我現在在抽煙”，“我想抽煙”，“我(將要)抽煙”。同樣，動詞在否定句中(用否定詞“不”)表示動作的非習慣性、不經常性或是不願意進行這種動作，如“我不

抽煙”可以指“我(一般)不抽煙”，或是“我(將來)不抽煙”，“我不想抽煙”。

如果根據上下文來看時間屬於過去，則不加詞頭詞尾的動詞在肯定句中表示過去動作的習慣性、經常性；而如果有否定詞“不”，則表示在過去沒進行這種動作，如“他從前唸書”(這曾經是他經常做的事情，他過去是學習，不是工作)，“他從前不抽煙”。

漢語動詞的重要特性是動詞發音不起變化而能表示伴隨主要動作而發生的動作(比較俄語的副動詞)，以及表示作為主要動作的目的動作，如“他坐着”，“他坐着吃飯”，“他來吃飯”。漢語從表示有某種動作對象的伴隨動作的動詞中演變出很多部分語法化了的動詞性前置詞，如“我用鋼筆”，“我用鋼筆寫字”。

這類動詞之中有某些已經完全失去用作謂語的功能而轉變成了前置詞。

在漢語中，及物動詞和不及物動詞的劃分不如俄語明確。兩者之間的區別首先在於及物動詞能有直接賓語，而沒有賓語則不表示及物的動作(如“發展生產”，“生產不能發展”)；而不及物動詞只能有表示地點或時間的賓語(如“他睡地板”)。如果沒有具體的行動對象，及物動詞常常用沒有新的詞彙內容的“一般”賓語，如“吃飯”。

大部分漢語動詞屬於動賓結構。

另一種動詞所特有的結構類型是動副結構，即把表示動作及其結果的詞素結合在一起。這一類型的動詞最主要的特點是能夠在詞的中間插進詞素“得”或“不”來表示達到這種結果的客觀可能性或不可能性，如“寫完”、“寫得完”、“寫不完”。在這種動詞中有一大部分加了詞尾以後表示動作的定向性，如“拿出來”，“拿出去”。

動副結構使動詞中後一個組成部分有語法化的最大可能性，並使其變為表示定向性、結果和體的詞尾。動詞變化的體系有一部分是在這種具有構詞功能的詞尾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

由兩個動詞部分用聯合結構組成的單詞本身成為兩個同義詞：一個是動詞，一個是名詞，如“發展”(是動詞也是名詞)。

動詞加上形容詞詞尾“的”用作名詞的修飾語時，表示某一事物帶有某種動作過程的品質，從動作方面來修飾人物或事物，而這種動作或是這一人物或事物所進行的，或是其所遭受的。在這種情況下，動詞構成了形動詞。在這種場合，及物動詞構成被動形動詞(如“寫的 信”)，而不及物動詞則構成主動形動詞(如“來的人”)。

形動詞和作為從屬形容分句或形容短語一部分的動詞，這兩者應該加以區別。在這類動詞後面的“的”不屬於動詞而屬於整個從屬分句(形容短語)而是表示修飾關係的記號，如“他寫的字”，“看報的人”，“昨天來的人”。

形容詞 歐洲語言中的形容詞和靜詞有好些共同的特點，因而形容詞和名詞構成一個統一的靜詞(имя)範疇；漢語不同，品質形容詞在性質上和動詞接近。

① 在某些場合中表示複數和所有關係的詞尾可以省去，如“我國”，“我們教員”。

品質形容詞和動詞一樣可以用作謂語而不需要繫詞(也可以加“是”，但是在這種情況下和在動詞前面加“是”一樣，僅僅是強調的意義)，並且可以加某些表示體的詞尾，如表示轉入一種新狀態的詞尾“了”，如比較：“他走了”，“天氣冷了”。

在形容詞謂語前面常常有副詞“很”，這個“很”幾乎已完全失去加強語氣的意義，而僅僅是為了突出形容詞的謂語性質。

形容詞和動詞一樣可以沒有形態上的變化而表示任何時間內延續存在的狀態，如“昨天不冷”，“我想明天很冷”。

有些品質形容詞沒有形態上的變化可以用作謂語的修飾語，如“飛機很快”，“他快走了”，“你快走罷”。

形容詞在結構上有的有單音節的，有的是多音節的(大部分是雙音節的)。而在無論那種情況下，形容詞常常加詞尾“的”。如果想加強形容詞的意義，則用重疊的方法。在這種情況下，雙音節的單詞每個詞素都要重疊。用重疊式構成的形容詞一般加詞尾“的”或“兒的”。這種形容詞可以用作謂語或用作名詞的修飾語，也可以用作動詞謂語的修飾語，如“他昨天還好好的”，“好好的一個人”，“你要好好(兒)地寫”。

副詞 副詞在句子中幾乎永遠表示狀況。副詞在本身結構上有的有單音節的，有的是雙音節的(三音節的較少)。有些副詞是加詞尾“是”(如“尤其是”)，“然”(在個別場合這樣的單詞也可以用作形容詞，如“自然”)和“地”而構成的。最後這個詞尾在文字上一般固定用“地”，為了在文章中區別副詞詞尾“地”和形容詞詞尾“的”，如“白白地”(徒然地)和“白白的”(顏色很白的)。

數詞 漢語數詞有兩種形式：不完全形式(即不加詞頭詞尾)用在抽象的數學計算上，如“一”、“二”、“三”。完全形式是數詞和單位詞尾的結合，用在具體事物的計算上，如“一個”、“兩個”、“三個”。數詞在語法方面的重要特點是數詞和名詞組成的短語在肯定句中能夠不借助於繫詞或動詞而用作謂語，如“他三十歲”；但是在否定句中就必須有這類動詞，如“他還不到三十歲”。

輔助詞和輔助詞素 漢語的輔助詞包括各種小品詞、前置詞和連接詞。從有獨立意義的動詞中分化出來的漢語前置詞有時在用法上和連接詞相像，如“我 和 他 說過，他不聽”，“王 同志 和 馬 同志 都 去過”。

單音節的後置詞帶有詞尾“頭”、“面”、“邊”(“邊兒”)等，在現代漢語中有相當的獨立性，而在句子中不但用作後置詞來肯定面積和時間，也用作地點和時間副詞，如“房子裏頭沒人”，“革命以後”，“我以後告訴你”。

介於輔助詞和詞頭詞尾之間的是輔助詞“的”。“的”加在從屬形容分句或形容短語後面時是輔助詞；“的”加在人稱代名詞、名詞、形容詞、副詞或孤立的動詞後面時在單詞結構中是詞尾，如“我給他的書”，“他的書”，“父親的房子”，“新的書”，“慢慢地走”，“來的人”。

四 句子構造

簡單句 漢語由於不是從形態變化(就單詞本身形態

而言)上來表示支配關係和配合關係，因此單詞在句子中的句法作用及其和其他單詞之間的關係，主要由單詞在句子中所處的位置來決定。因此句子的各種成分在句子中的位置是固定的。

如果單詞在句法上的作用及其和其他單詞的關係改變了，那就要改變這個單詞在句子中的位置。修飾語永遠放在被修飾語前面(如“中國人民”，“人民中國”)，主語按理在謂語之前，而賓語則在謂語之後(如“他們幫助人家”，“人家幫助他們”)；狀語常常在主語之前或在主語和謂語之間(如“今天他不來”，“他今天不來”)，可是表示結果的狀語永遠在謂語之後(如“你要講個明白”)。

如果談到對方還不知道的某些新鮮事物，那就不用單純的一個謂語來表達，而要用主語加謂語的整個複合結構來表達，或者就用主語本身來表達，不過在這時謂語要用不及物動詞或進行式的及物動詞，而主語則放在謂語後面，如“來了客人”(通知客人到來一事)，“來了一個李先生”(通知誰來了)，“那裏開着門”(通知房子的門開着沒關)。

表示動作對象的單詞經常是賓語，放在謂語後面。然而如果注意中心是這個對象並且要談到這個對象發生了什麼事，那末表示這個對象的單詞要提到句首去，如“我買了教科書”，“教科書我買了”。

複合句 漢語複合句或者由兩個簡單句聯合組成(可以用連接詞也可以不用)，或者一個以上的簡單句併入另一簡單句而作為後者的擴展成分，如：

“他來，你去”，

在這個例子中，我們見到的是兩個不用連接詞的並列的簡單句，雙方發生時間上(或條件上)的聯系。

“(因為)今天很熱，(所以)我不穿大衣”(可以用連接詞，但是不是必須用)；

“我知道他是學生”(“他是學生”整個作為動詞(主)(謂)(賓))

“知道”的賓語)；

“他是好人，我們都知道”(主)(謂)(謂)

漢語句子的特點是作為賓語的一個成分，一方面從屬於前面的動詞謂語，而本身又用作後面一個謂語的主語。這種結構在具有敦促意思的動詞和動詞“有”的句子中最為常見；如：

“我叫他買了這一本書”。(主)(謂)(賓/主)(謂)(賓)

“我們有五百個人參加大會”。(主)(謂)(修)(賓/主)(謂)(賓)

(以上譯自原書序文)

五 馬爾及其繼承者關於漢語的反科學理論

前面談到的好些問題在蘇聯漢學界很長時期流行着各種反科學的觀點，馬爾及其繼承者從外國資產階級的語言學者方面吸取了很多關於漢語的歪曲理論，傳播了反科學觀點。

很多西方漢學家和俄國的漢學家不同，他們主要是從書本上來研究漢語的，(轉28頁)



《中國文字拼音化問題》

(中華書局出版 1954年1月初版)

杜子勁

《中國文字拼音化問題》是《中國語文叢書》的一種。這是一本從1952年下半年到1953年上半年一年間的有關文字改革方針及情況的重要文章的彙集，是新中國成立後文字改革運動中的重要文獻之一。

1952年是中國文字改革運動中劃時代的一年。中國文字改革運動從1862年起，到1952年止，這六十年間可以劃歸為一個大階段。從1952年起便走入一個新的階段。六十年間的文字改革運動的主要特點是摸索、研究、試驗，因而表現出意見紛歧、步調不一致的狀態，總之還停止在醞釀階段。它的主要的歷史標誌是切音運動，注音字母運動，簡體字運動，國語羅馬字運動，拉丁化新文字運動。1952年以後，便起了根本上的變化。這一年的二月五日由中央人民政府文化教育委員會領導的中國文字改革研究委員會正式成立。這樣在中央政府統一領導下成立一個機構，有組織有計劃去研究並進行文字改革，在歷史上還不曾出現過。所以它的成立，就成了文字改革運動中的新的標誌。它在成立之初，首先就把六十年的改革運動的各項經驗初步地整理一下，作了一個總結式的報道，那就是已作為《中國語文叢書》之一的《中國文字改革問題》。該會和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合編《中國語文》雜誌以後，發表了各家的意見，展開討論。這本《中國文字拼音化問題》就是從第一一年中的《中國語文》上選出的。

全書是按文章的性質編排的，約可分為四部分。第一部分是郭沫若、馬敘倫、吳玉章等幾位同志在中國文字改革研究委員會成立會上的講話，第二部分是章彥、羅常培、丁西林等幾位同志的論文。第三部分是曹伯韓、鄭林曦、拓牧等的論文。第四部分是中國文字改革研究委員會的成立經過，工作情況，會議記錄以及工作計劃等報道。現在僅就第一、二、三部分概略地介紹一下：

第一部分的內容主要是關於走拼音化的道路問題。郭沫若同志指出：“從我國文字本身發展過程來看，由象形進到形聲，是合乎世界各國文字發展的一般趨勢即走向拼音化的道路的。中國文字走向拼音化，在各方面都有方便，如寫口語，用打字機以及和外族、外國交流文化、吸收其語言等等”。

重要的是馬敘倫同志在《開會辭》中所提到的毛主席的指示，他說：“三、四個月以前，主席（指毛主席——筆者）又指示我們：文字必須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

第二部分主要說明兩個問題：一是為什麼要採用拼音文字，二是說明實行文字改革要具備哪些條件。在第一個問題上，章彥同志指出祁建華速成識字法成功的主要關鍵之一是“利用注音字母來注音，使漢字與語音結合”。接着他就說明“假使我們的文字是拼音的話，人們學會了拼音，無須突擊

筆畫繁雜和跟語音脫節的漢字，便可以學習閱讀和寫話；那麼，讀書識字的困難更會減少，學習時間更會縮短”。有些反對文字改革的教育家也感到漢字的難寫難念難記是教學進度的一大障礙，但是他們不認為這是漢字本身問題，而認為是教學法和教材編輯上的問題。章彥同志也針對這種情況指出：“教學法的改革和教材組織的改進，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減少學習的困難，但不能夠把漢字本身所帶來的基本困難完全克服。……漢字的基本困難的完全克服還要有拼音文字才行”。

對於第一個問題，丁西林同志的文章是更詳細而全面的說明。他的結論是：“我們可以說：祇有採用拼音文字才能解決漢字的基本困難”。

在第二問題上，羅常培同志很具體地列舉以下六種條件：

（一）首先必須有工人階級領導下為人民辦事的政府；（二）政治、經濟必須達到全國能由中央統一領導的集中程度；（三）必須基本上有了在政治、經濟集中條件下形成的民族語；（四）拼音文字方案和拼音方法應該根據羣衆的基礎相當地照顧民族形式；（五）文字研究應與語言研究緊密結合，關於詞的連書和定型必須服從民族語的結構規律；（六）從事文字改革的語文工作者必須有戰鬥的精神和熱情。

他並且說：“前三種條件無疑地咱們現在已經具備了，後三種條件也正在逐步地準備中。”

第三部分裏的文章是解答了一些有關文字改革的具體問題。這些問題是：文字改革有什麼現實的意義？拼音文字裏是否有保留意符的必要？字母的形式問題，拼音文字實行後漢字的存廢問題，漢語的方言存在是否影響到拼音文字的實行等。

鄭林曦同志用對話的體裁很通俗地說明文字改革是一個迫切的現實問題。他首先說明工農兵羣衆學文化是需要文字改革的，一般文化教育事業是需要文字改革的，然後又說明學校教育對於拼音文字的要求是迫切的。

在拼音文字裏要保留下一部分意符，這種辦法曹伯韓同志管它叫做“半拼音”。這種半拼音的辦法有好多種方案，也有很多人擁護它，它在拼音文字運動中是有相當的勢力的。曹伯韓同志從各方面來指出這種辦法的行不通和理由的不充足，這是很必要的。

拓牧同志在他的論述中具體地說明如何解決方言懸殊的技術上的問題，並且說明了方言文字在一定區域內使用的意義。他的全部的論述是相當的詳細而透闢的。

總之，這本《中國文字拼音化問題》的論文集不是在那裏提出些問題，而是肯定了並且說明了一些問題；不是一般的空泛的議論而是用具體的材料根據科學的理論來解答一些問題。



談談文字改革的觀點和方法

傅 永 康

漢字是記錄漢語的工具。它有了幾千年的歷史。我們的祖先利用它記錄下了光輝的古代文化成果：政論、法律、科學、哲理、詩詞歌賦等等。其中有不少文學作品是世界馳名的。我們的文字現在還記錄着世界傑出的魯迅文藝和毛澤東思想，他們的思想正指導着和鼓舞着所有被壓迫的人民，而且記錄得很好。漢字經過長期的發展，體系逐漸地形成，詞彙也逐漸地豐富起來。但是由於長期封建政治的束縛和舊社會科學水平的限制，它仍然存在着嚴重的缺點，需要從新用科學的方法澈底地加以改造。

是不是說由於它有某些嚴重的缺點，就沒有一點可取的地方了呢？是不是應該全部否定，立即拋棄呢？這是需要極慎重考慮的。漢字表示聲音的方法不好，不如用拼音字來代替，但是它的義符如何呢？義符的位置不規律，有在上、有在下、有在左、有在右、有在左上、有在右上、在字內、在字外。一個符號代表多種意義，如“木”表示樹木，又表示木器，又表示與木有關的甚至與木不相干的其他含義。同一意義用幾種符號來表示，如“水”有“水”“冰”“冫”“𠂇”。“手”有“手”“扌”“爪”“又”等。義符還有筆劃複雜的毛病，這些自然都是缺點。是但它有基本的一面，它能使人望文生義，則是事實。這却是它的優點。區別同音詞，是它的不可忽視的作用。因此義符的問題是位置固定化的問題，是一符一義的問題，是筆劃簡化的問題，而不是一點好處都沒有。如果我們以“木”加在表示所有的樹木詞兒的前面，以“艹”表示所有花草，不再表示其他，這樣依客觀事物的種類或規律來規定，就可以使文字容易學，容易認，容易記憶，而且可以區別同音詞，使文字富於形象。

文字改革不應脫離現實，我們要從中國現代的語言文字出發。研究語言文字問題，同樣的也要根據它本身的特點，並從這些特點中找出正確的辦法來。

漢族語言文字的特點是什麼呢？漢語的根詞絕大多數都是單音的，這些根詞之中很多已經發展成了複音詞，但它們絕大多數以單音的形式當詞根和其他變成詞根的根詞相結合成為基本詞彙。因此基本詞彙多數是雙音的，但它的詞根是單音的。根詞又和基本詞或基本詞和基本詞相結合成為整個漢語的詞彙。當根詞又和基本詞、或基本詞和基本詞相互結合為新的詞兒時，雖然它們是兩個三個或者更多個音節的複音詞，但是仔細分析起來，詞根大多數仍然是單音的。又由於根詞和基本詞彙是最基本的詞或比較基本的詞，用得最多，因此經常見到詞多半是兩音的或單音的。又由於根詞充當詞兒的詞根時，原形不變，清楚可識，這就突出地顯示根詞當詞根時在詞中的顯著的作用和詞兒的結構形態，能使我們從詞根中去領會詞意。由於詞兒多而詞根並不多，因此當文字從詞根中領會含義時，就減少了學習的困難。又由於根詞定形不變，詞不能連寫，根詞使用逐漸發展的結果，使根詞

當詞根時的用法變成了其根詞的一種用法。由於字多數都是單音根詞，所以一般又變成了字的一種用法，因此顯得字的用法比較複雜。又由於文字沒有拼音字母，很多字都有借聲的用法，由於時代的變化，部分詞義字義起變化，這就更增加了每一個字運用的困難。這些都是事實。漢語詞中很多已複音化，但是受了文字不能連寫的影響，新的複音詞並沒有代替單音根詞，這也是事實。純拼音新文字方案，抹殺了每個單音根詞的獨立性，置同音詞於不顧，主張詞是活在連續的句子裏的錯誤說法，因而當句子裏詞兒多數是複音的時候，還馬馬虎虎行得通，當句子裏詞兒多數或很多是單音的時候就缺點備露，使人每句必猜，非常模糊。人們不能從詞中看出詞根，也不能從詞根中去理解詞義，增加了學習的困難。有的把一些不穩的詞連寫起來，有的根本不是詞也連寫起來，這就脫離了漢語詞兒結構的形態，失去了原文字的靈活性。至於個別的人想以複音詞和人為的複音詞代單音詞，則更墮入改革語言的泥沼中了。我們應當根據這些現代語言文字的特點，首先造出根詞來，然後根據原根詞轉化為詞根、詞頭、詞尾並相互結合為詞的方式，即語言的詞彙的結構形態，去建築起用新文字書寫的舊詞，這也就是我認為的詞兒連寫的原則，然後一個一個、逐步地、代替舊文字寫成的全部詞彙。

中國人民的長遠利益和客觀需要是我們一切工作取捨的總準繩，是鑑別一切的總出發點。我們要長期打算，但首先要解決的是目前最迫切的關鍵問題。目前最迫切的是要有一種既能繼承保存舊文化，又能從舊文字中解放出來的一種極易為各地區廣大人民掌握使用，最能結合現在漢語的特點的新文字，而不是從新創造一套以一地為標準音的純拼音文字。具體的說最迫切的問題是把舊文字的義符按客觀事物的種類或規律普遍地、澈底地、科學地加以整理。以拼音字母代替形聲部分，把舊單音根詞(字)整理為新形聲字。並在這個基礎上把應該和可能以純拼音的方法代替的詞彙(如借聲詞，借意詞，變了意義的詞、複音整體的詞以及一切常用的兩根同義詞和抽象詞等等)，改為拼音文字。純拼音文字不能很好地表達現代語言，也不能很好地繼承保存舊文化。它不能全部很好地接替舊詞彙，因而也不能真正從舊文字中解放出來。所以我們首先考慮的不是如何建立拼音文字，目前文字改革的重點也不在造一套科學美觀的民族形式的字母，而那些首先考慮字母，現在還看中了拉丁字母，說它便於利用英文打字機，利用英文打電報，便於學習外國文，學習科學及其略號等好處的人，都過高地估計了拉丁字母的優點，都沒有注意到漢族語言文字的特點。

文字改造是文字的改換工作。是以新文字代替舊文字的工作，是以一個新文字寫成的詞代替一個舊文字寫成的詞的工作。因此在新文字推行時，只有在新文字的確比舊文字好

的時候，才能為人民大眾所接受。在兩種文字並行時期，所有的詞彙不為新文字所佔領，就為舊文字所佔領，新文字所不能表達或表達得不好時（如同音詞不能區別或其他等），舊文字就仍然會被使用着，這是必然的事實，在文化高潮將要到来的時候，人民對文字的要求是日益迫切的，同音詞的問題就會更突出地表現出來。用純拼音文字去改革將會帶來像日本文一樣的困難，文章中有拼音文字，也有舊方塊字，兩者互不相上下而又不能統一。中國也走這條路就不能迅速掃除舊字，就不能很容易地為人民所掌握，從而提高科學技術和文化的水平，這是可以想像的。我們漢語的單音性比日本為嚴重，使用舊文字的歷史更長，使用的人數更多。不可以想像經過三五年的平行使用，就可像朝鮮文一樣安然的離開了漢字。《文字改革》中提出的辦法的結果，我看是有這個危險的。

文字改革是一件大事情。它把所有舊文字都改革為新文字，因而牽涉到所有古代的和現代的文獻。它將給所有人民去學習，因而牽涉到所有現在已經識字的人，正在識字的人和將要識字的人。它和人民革命一樣，是在文字方面一個翻天覆地的大革命。面對着這一偉大的任務，我們不能不用最大的耐心，不能不吸收廣大羣衆的智慧和意見。我們要依據為六億人民的長遠利益打算的原則，用最新的科學方法，去創造一個既切合我國現代語言的實際情況，而又在字形上保有民族的固有的優秀手法和傳統，使成為藝術風格的民族形式的新文字。

“不”能和名詞聯合嗎？

吳魯

高名凱教授駁覆穆德洛夫同志說，“認為‘山、水、魚、人’不能跟‘不’直接聯合，這說法不但與事實不符，而且違反原則。事實上‘山、水、魚、人’可以跟‘不’聯合（例如：他簡直畫得山不山，水不水，魚不魚，人不人）。因此，我們不能單憑詞典詞的聯合來規定漢語的某一個詞是動詞或是名詞”（參看《中國語文》26期16頁）。高教授的見解，表面上看來是正確，但實質上站不住腳。

呂叔湘先生說過：“君不君”這種“不”和名詞聯合的現象，是“文言裏的特別用法”，口語裏應該是“君不成個君”。“不”下面的“君”只“表示一種性質或狀態，作用和形容詞相同”（《中國文法要略》上卷91頁）。最近也有人說“人不人不鬼”這個成語，是由“不像人，不像鬼”省略而來（《語文知識》25期39頁）。高教授對別人這些發現，似乎沒有加以注意。

我們不能拿某些文言成語的結構來解釋現代的漢語。譬如《詩經》裏的“子不我思”，《公羊傳》裏的“錫之不毛之地”，用普通說法只能是“你不想我”“不長草木的地方”，而不能是“你不我想”“不草木的地方”。

除了文言成語之外，對話時為了加強語言的效果，也可以把名詞重疊起來，中間插個“不”字。高教授的“我才不管它布不布呢”（《中國語文》26期14頁）就是這一類。要是憑空說個“我才不管它布不布呢”，一定會使人莫名其妙。只有：張三拿着布要撕，李四看見了說：“這是布哇，別撕！”張三滿不在乎的回答：“我才不管它布不布呢，撕了再說”。這話才有着落。語言中表示放任、鄙視或不滿的神態時，常用這類句子。例如：

助手：敵人的飛機來了！

司機：管它飛機不飛機，咱只管開車。

匪首：我是師長。

戰士：什麼師長不師長，當了俘虜就要聽我的！

這些和“不”聯合的名詞，同樣是省略的說法，它比說成“來飛機不來飛機”，“是師長不是師長”要經濟些。並且這說法只在名詞疊用的情況下才能出現，如果把前一個名詞拿掉，留下“不飛機”“不師長”，就不成話。

我們分析了這些情況，就不會承認“不”能和名詞聯合了。

簡化漢字不應取消詞的形態區分

吳熾堂

《中國語文》第28期刊載了劉文英同志的《漢字的簡化問題》。我以為提出“簡化漢字”是很對的，但是如果因為提倡簡化，就連“他、她、它”也都主張不加分別，那就未免矯枉過正了。要知道“他、她、它”和“咳、噲”“噢、哪”之類是不同的，“他、她、它”各代表着不同的意義，只有分寫才能嚴密而正確地表達出我們的思想，比如：在“姐姐和弟弟在一起溫習功課。他教他演算代數”這句話裏，我們就不明白到底是姐姐教弟弟，還是弟弟教姐姐，如果寫作“她教他演算代數”，或者“他教她演算代數”，意義就很明顯了。我覺得“他”、“她”分寫並不是“重男輕女”的問題，而是有關“形態學”的問題。在英語中，有“he、she、it”的分別；在俄語中也有“он、она、оно”的分別。在北拉新文字中也是分別寫作“ta、taa、to”的。我想，在漢字改革後的拼音文字中，也將會把第三人稱單數的代名詞分別開來拼寫的。因此，我以為“他”、“她”、“它”（牠）分寫正是符合語言的發展規律的，是一種進步的趨向，只應提倡，不宜“簡化”。

同樣的，疑問代名詞“哪”和指示代名詞“那”也是應該分寫的，在語言中，它們不但表示不同的意義，而且連語音也是不同的，關於這問題，呂叔湘、朱德熙兩位先生說得好：“指示代名詞‘那’和疑問代名詞‘哪’，從前都寫作‘那’，近三十年來才在疑問代名詞上加個‘口’字邊，以示區別。有許多守舊的人還是不理會，還是一概寫‘那’。其實‘那’和‘哪’寫成不同的樣子，比‘他’‘她’‘它’更有理由，因為這不僅是書面的分別，是代表不同的語音的。指示的na是去聲，疑問的na是上聲，在語言裏是截然不同的兩個詞（正如‘實’和‘買’），為什麼不在文字上加以分別呢？”（見《語法修辭講話》93頁，中國青年出版社版本）。

總之，漢字是應該簡化的，但是不宜簡到取消詞的形態區分。

勘誤表

期	面	欄	行	誤	正
26	13	右	倒1	很白的	很明白的
27	24	右	4	半低2，繼續降至低1，所以寫成21	中3，繼續降至半低2，所以寫成32
27	24	右	表二	南京話 21 115 122 144 15	南京話 21 114 122 143 145
27	24	右	表二	文登話 183	文登話 144
27	25	右	倒7	就着北京話來說明	就着北京話來說
27	27	右	倒4	[h]	[6]
27	35	右	15	勿勞	勿勞

標準語* (語言學名詞選譯)

Н. Ю. 施維多娃著
劉湧泉譯

標準語 (Литературный язык) 這個詞有兩個意思:

(一)在民族還未形成的時代,它一方面是以其各種不同體裁服務於文牘、文學、宗教和科學的書面語言,而另一方面是人民大眾詩歌創作的語言;(二)在民族語發展的時代,它是民族共同語的加了工的形式,以其口頭和書面的形式服務於民族的文化生活,服務於民族的社會活動的一切方面。在民族形成以前的時代,由於人民生活的文化歷史條件的不同,標準語可以是(1)在諸方言之中的一個方言的基礎上形成的書面語言,或者(2)作為書面交際形式強加在某一族人民頭上的他族語言〔例如:一些說突厥語的民族(烏茲別克人,土爾克明人)所使用的阿拉伯語,蒙古地方的藏語和滿語,以及(局部的情况)中世紀歐洲的科學和宗教語言——拉丁語〕。隨着民族的形成,他族語言就要被那種在民族共同語的基礎上形成的新標準語所排斥,雖然這些他族語言在民族共同語或它的個別體裁的詞彙中還存留一些遺跡(在語法中較少)。如果在民族形成以前的時代,標準語不是他族語言,而是在諸方言之中的一個方言的基礎上形成的語言,那麼這種標準語的那些已經擺脫了古老面貌的,豐富了的和發展了的形式就能轉變為民族共同的標準語。例如,古俄羅斯標準語在某些種文體(宗教的、修身的、傳記的、翻譯的、歷史的文獻)中有它的近親的古斯拉夫語的很多特點,這些特點使那些沒有接觸書本文化的人難於了解書面作品。然而,隨着民族的形成,俄羅斯標準語擺脫了那些古代的、非民族共同語所固有的特點,古斯拉夫語的許多成分被同化,成了民族共同的、俄羅斯標準語的有機部分。

通常作民族語基礎的是部族語言,這種部族語可以因某一種方言的影響而發生重大的變化,但影響部族語的這種方言必定是由於政治或文化條件而提昇到第一位的,並能充分反映該語言發展的一般趨向的。這樣的方言在詞彙和語法方面往往好像是該語言的方言系統中的過渡的,最典型的和最中立的方言。例如,俄羅斯民族語形成時,情形就是這樣的,它是在南部大俄羅斯諸土語(尤其是庫爾斯克—奧勒爾方言)的影響下形成的;烏克蘭民族語形成時,情形也是這樣的,作為它的基礎的是坡爾塔發—基輔方言;法蘭西民族語形成時,情形仍是這樣的,作為它的基礎的是法蘭西島省(Ile-de-France)的方言。

在民族形成和發展的時代,標準語是固定在文字中的民族共同語,它以過去豐富的傳統為基礎,並且不斷吸收民族共同語各方言中最一般的和最典型的特性。民族形成之前,標準語的功用及其各種體裁的使用範圍是有很大的限制的。在封建社會裏,它只替比較小的一批受過教育的人服務。在資產階級社會裏,標準語的功用擴大了,但是廣大的人民羣衆還是不能充分利用全民的文化成就。只有在社會主義社會裏,標準語才完全成了它的創造者——

人民的財產。在人人識字和民族文化繁榮的條件下,標準語滲透到人民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並逐漸成為口頭和書面的民族共同語的唯一形式。那些先前沒有文字的(或剛有文字萌芽的)各族人民和那些使用他族語言的文字的各族人民在社會主義社會中都發展了自己的標準語。作為新的高度文化工具的標準語是在諸方言中最能充分反映全民語言特點的一個方言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這種標準語具有科學地研究出來的正字法系統,具有豐富了的詞彙、發展了的語法結構和分門別類的文體系統。

在不同的歷史時期裏,標準語中各種在功用上不同的體裁的出現是和標準語的各種不同的功用相聯系着的。民族共同的標準語是人們直接交際的工具,它給文藝、科學、技術、行政—法律工作、政論等各種體裁服務。標準語的各種文體或它的功用上的變體是相應地分化出來的。標準語愈發展,它的體裁也就愈豐富,各種體裁之間有一定數量的同義表達手段互相區別開來。

不應當把“標準語”這個概念和“文學(文藝)語言”(язык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這個概念混為一談,後者只是民族共同的標準語的應用領域之一。它可以超出標準語的規範:為了使作品產生思想—藝術的作用,它可以吸收一些來自俗語、方言、同行語的詞和形式,並且可以吸收作家個人創造的一些成分。

民族共同的標準語是各種規範——用詞的語法規範、語義規範,以及正字法、正音法的規範——的一種系統。標準語的各種規範是逐漸發生變化的。新規範的出現和舊規範的消失是與民族共同語按其內部發展規律所產生的變化相聯系着的,它們通常是通過標準語的會話形式而在標準語裏實現的,因為這種會話形式的標準語是經常以還未進入標準語的那些民族共同語變體(俗語、專業語)、以那些區域方言來充實自己的(主要是詞彙方面)。

標準語和活的會話的全民語言以及方言間的相互作用,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有不同的性質。在封建社會的條件下,人民大眾沒有利用標準語,因而標準語的規範和全民會話語言的規範大不相同。隨着標準語功用的擴展,它的規範也就和全民會話語言的規範接近起來;到了社會主義時代,標準語的規範極其明確地、極其周密地把民族共同的語言規範固定了下來。另一方面,標準語規範中的一些變化(主要是詞彙和造句法方面的)也可能是因為受到一些語言巨匠們個人的影響而產生的。這樣一來,標準語可以說是民族共同語以及部分地它的諸方言的各個方面經常發生相互作用的領域。

(*譯者按:有人把 Литературный язык 譯作“文學語言”,不大妥當。)

(譯自《蘇聯大百科全書》第二版第二十五卷)

部 首
排 列

新華字典

新華辭書社編輯

1954年12月出版·定價11,000元

這是一部以小學教師、初中學生及相當初中文化程度的幹部作為讀者對象的字典。

全書共收字頭(包括單字和複詞)七千三百餘條,全部字數(包括注解和附錄)約五十萬字,插圖三百八十餘幅,篇幅在七百面上下。開本長142公厘,闊102公厘,紙面布脊精裝,1954年12月出版。

本字典編輯的總目標是爲了幫助讀者掌握祖國語文的規律。編輯的精神着重在“現代化”和“規範化”,力避舊日字典注解籠統含糊的習氣,特別注意實際應用的例證;因而初步表現了“推陳出新”的意義。編輯體例也提供了一些新辦法,改變了向來字典的面貌。

本字典已經出版過一種按音序排列的版本,現爲適應讀者需要,再把字頭按部首排列,並附“音序檢字表”以便參用。

附錄九種都很切合日常查考之用。

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新華書店發行

中國文字改革研究委員會合辦
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



月刊

一九五四年十一月號

第二十九期

一九五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出版

編輯者 中國語文雜誌社
北京西單新皮庫胡同乙十二號

社長 章 懋

編輯委員 呂叔湘 吳曉鈴 林漢達

章 懋 曹伯韓 傅懋勳

葉恭綽 葉聖陶 葉韻士

黎錦熙 鄭之東 羅常培

總編輯 羅常培

副總編輯 林漢達

出版者 人民教育出版社
北京佟麟閣路十號

印刷者 北京京華印書局
北京虎坊橋

總發行處 郵電部北京郵局

訂購處 全國各地郵電局、所

代 訂 處 全國各地新華書店
代 銷 處

1—31,550

預定辦法 { 三個月三期 4,800元
半年六期 9,600元
全年十二期 19,200元

寄費 { 1.平郵寄費不計
2.掛號郵費由定戶負擔